《臺大東亞文化研究》第三期　OCT 2015
DOI: 10.6579/ NJEAC.2015.3.3

在主體性與他律性之間：戰後韓國學界的十七世紀朝鮮對外關係史研究特徵與論爭

李孟衡*

日本殖民韓國時期，開展了許多朝鮮史的相關研究，並累積不少成果。然而，其內容多反應當時日本人之朝鮮觀，並不無刻意擁護、合理化日本對朝鮮之侵略與殖民之嫌，故戰後飽受批判。其主要論點可概括為日鮮同祖論、他律性論、停滯性論、黨派亡國論、半島地理決定論等。而其中，又以他律性論與停滯性論最核心。因此，克服他律性論與停滯性論便成為戰後韓國史學界的核心課題。

為達成此一目標，如何重塑十七世紀朝鮮之對外關係史相，便成為戰後韓國史學者的重要課題之一。其中一條路線，便是肯定第十五代國王光海君（1575-1641，1608-1623 在位）的兩端外交政策，其代表為李丙燾、韓明基。而韓明基更將十七世紀朝鮮的水軍、國內政變等，與明清交替、東亞國際秩序變遷等連結，以求凸顯朝鮮之主體性。然而，這種做法實際上也等同承認了「他律性論」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也不無道理。桂勝範則以朝鮮時代的海外派兵經驗來尋找朝鮮之主體性。桂氏以為，朝鮮在明朝正統、成化年間，曾經猶豫，甚至拒絕明朝之派兵要求，足見朝鮮的「事大」有其目的性，並藉此凸顯朝鮮之主體性。然而，這便落入了其自身所批判的「內在的發展論」之框架中。因此，無論是韓明基「他律」中的「主體」，或是桂勝範「派兵」中的「主體」，都反映了十七世紀朝鮮對外關係史的特徵：走在主體性與他律性之間。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

另一條超克他律性論的路線，則是「朝鮮中華主義論」。該學說認為朝鮮在明亡以後已成為中華之正統繼承者，並將尊周思明、華夷觀等思想與韓末之抗日義兵運動連結，認為這是一種時代精神，重新肯定了朝鮮中華思想的歷史意義。該說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朝鮮已不再是小中華，而是繼承了中華。因此，朝鮮中華主義也就成為了克服他律性論、建立主體性的重要武器。

然而，這一學說自創始之初，便深受韓國學界的各種批評。原因在於，朝鮮中華主義係一僅僅強調中華的文化層面且深染明朝色彩的思想體系。批判朝鮮中華主義論者以為，該說漠視了中華內涵中的種族與地域之特性，刻意強調朝鮮繼承中華的文明，並且再次陷朝鮮史於「他律性」陰影之下。不論爭論雙方誰是誰非，這其中都透露了一個清楚的訊息：直至今日，樹立朝鮮歷史之主體性與克服殖民史觀之他律性論，對韓國學界而言仍屬重要。同時，也再度凸顯了自戰後乃至於近來十七世紀朝鮮對外關係史研究之特徵：走在主體性與他律性之間。

關鍵字：他律性論、主體性、光海君／仁祖評價、朝鮮中華主義論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著於亞洲大陸中心附近的半島，不論是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都必定受大陸變動之餘波所影響。同時，又因為其所處之周邊位置，而常常脫離於本流之外。我想從作為朝鮮史顯著特徵的附隨性來理解」
——三品彰英，《朝鮮史概說》

「李氏朝鮮時代自西元一三九二年太祖即位起，歷經一八七六年開港、一八九七年大韓帝國改號等大事，迄一九一零年日韓合併之前後五百一十九年之間，觀察者概括該時代社會樣貌之結論，可以『停滯性』一語道盡」——四方博，〈舊來の朝鮮社會の歷史的性格について〉

一、前言

日本在殖民韓國時期，開展了許多朝鮮史相關研究，並累積了不少成果。然而，其內容多反應當時日本人之朝鮮觀，並不無刻意擁護、合理化日本對朝鮮之侵略與殖民之嫌，故日後飽受批判。[1]主要論點可概括為「日鮮同祖論」、「他律性論」、「停滯性論」、「黨派亡國論」、「半島地理決定論」等。而其中，又以他律性論與停滯性論最為核心。所謂黨派亡國論、日鮮同祖論、半島地理決定論等，也都與此相關。因此，克服「他律性論」與「停滯性論」便成為戰後韓國史學界的核心課題。

其中，十七世紀明清交替之際的朝鮮對外關係史，正是戰前日本學者用以證明朝鮮歷史停滯、他律的核心論據。在如此情況下，戰後韓國學界如何書寫十七世紀朝鮮對外關係史？所採取的歷史敘述，具有何種特徵？而韓國學界內部對此又產生了哪些論戰？這些論戰呈現了何種意義？本文將以戰後韓國史學界關於第十五、十六代朝鮮國王光海君／仁祖評價、朝鮮中華主議論之論爭，嘗試分析並回答上述問題。[2]

[1] 持此論者不僅限於韓國學者，包括日本學者、美國學者皆有之。相關研究參見寺內威太郎，〈「滿鮮史」研究と稻葉岩吉〉，收入同氏等編，《植民地主義と歷史学——そのまなざしが残したもの——》（東京都：刀水書房，2004），頁 19-70；John. B. Duncan, *The origins of the Chosŏn dynas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p.3-9.

[2] 文中日、韓文資料之中文引文，皆為作者自譯。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他律性論：日本殖民史觀下的韓國史命題

（一）稻葉岩吉與三品彰英的命題

事實上，所謂「停滯性論」與「他律性論」，並非同時出現，內容也互有差異與出入之處。以「滿鮮史」大將稻葉岩吉（1876-1940）而論，最早係強調朝鮮社會的停滯性而非它律性。稻葉在氏著《朝鮮文化史研究》（1921）中便以「停滯之社會相」（停滯せる社會相）為〈朝鮮社會史の一斷面〉第一節。在該節中，稻葉指出由於「半島的地理狀況」——處於一個無風的地帶、得免於許多低氣壓之波及，以至於「其民族流於安逸」，並使半島的社會組織遂為固定，即便有所變化，程度也極其緩慢。[3]因此，他認為「朝鮮民族之當下社會，一言以蔽之，除停滯之外無他」。[4]

若依稻葉在〈朝鮮社會史の一斷面〉中所論，「半島的地理性」使朝鮮社會停滯，那麼朝鮮歷史應該不至於「他律」才對——因為極其穩定。然而，在同書之第七章〈朝鮮滿洲與支那之關係〉（朝鮮滿洲と支那との關係）討論清太祖（1559-1626，1616-1626 在位）之興起時，他卻道：

> 文祿之役時，因我豐臣秀吉在半島與鮮、支兩國之衝突，使本就疲憊不堪的半島更陷殘破；遼東方面，由明國所支撐的國防也因而紊亂，遂成此機緣，清太祖努爾哈赤乃起。似乎應該說，秀吉係為努爾哈赤作嫁。[5]

換言之，稻葉強調來自日本的衝擊，遂導致支那（明朝中國）與朝鮮之衰弱，於是促成了努爾哈赤的崛起與明清交替。這種說法可算是滿、鮮史上「他律性論」的代表之一。[6]但同書中，如前文所述，稻葉明明稱朝鮮社會極為穩定而停滯，又怎麼會如此輕易便「他律」了呢？原來，這與朝鮮國內的情勢變化有關，特別是光海君與仁祖時期。他在 1933 年的《光海君時代の滿鮮關係》中談到光海君遭廢時說：

---

[3] 稻葉岩吉，《朝鮮文化史研究》（東京：雄山閣，1921），頁 49-53。
[4] 稻葉岩吉，《朝鮮文化史研究》，頁 48。
[5] 稻葉岩吉，《朝鮮文化史研究》，頁 216。
[6] 此論也不斷為韓國史學者提及，詳見後文三的（二）、（三）小節，韓明基與桂勝範部分。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 王遭廢後，清軍遂入侵半島。而在清軍第二次入侵之際，乃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凡此種種，皆是王被流配於絕島後所發生之事。[7]

由此可以看到在稻葉岩吉眼中，丁卯、丙子胡亂之所以產生，係與朝鮮內部之政變有關。乍看之下，這似乎肯定了朝鮮歷史的主體性。實則不然。這與稻葉如何評價光海君（1575-1641，1608-1623 在位）之外交政策有關。

他指出，光海君「與其它臣下不同，不重視明國一直以來的努力」，使「朝鮮半島確實多少存有輕視支那本部的氛圍」。[8]因此，光海君所採取者係重視實質的「澤民主義」，不似備邊司大臣一般，「只重視政治上的體面，不問對手為何、不自揣是否有力量追隨（明國），徒惹事端，陷人民於禍患、社稷於危殆」。[9]由此可見，在稻葉眼中左右朝鮮歷史之主要力量，並非朝鮮本身，而是來自大陸（滿蒙、支那）之勢力。如此情況下，朝鮮只有選邊站之餘地。

相較於稻葉比較迂迴、間接的他律性指控，其後三品彰英（1902-1971）之論便顯得直截了當。三品在氏著《朝鮮史概說》序說中，便以〈朝鮮史的他律性〉（〈朝鮮史の他律性〉）為開頭，為朝鮮史定調。他指出：

> 附著於亞洲大陸中心附近的半島，不論是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都必定受大陸變動之餘波所影響。同時，又因為其所處之周邊位置，而常常脫離於本流之外。我想從作為朝鮮史顯著特徵的附隨性來理解。[10]

從三品的這段談話中，清楚看到了他對朝鮮史的見解：朝鮮的歷史是「他律的」，這與其所處的「周邊位置」有關。這種看法便是所謂的「半島地理決定論」。他本人也絲毫不避諱，並強調「假若今日彼等之地域與民族存在於大陸之中央位置，那麼絕對不會形成如此之半島史」。[11]

那麼，所謂朝鮮史之他律性究竟為何呢？三品以為，朝鮮的歷史「是所謂事大交鄰的歷史」、「是外來文化受容的歷史」。他指出，朝鮮的事大主義，是「被認定為絕對的存在而服從於國外勢力，並透過威權主義以維持國家」。而這種事大主義最為發達之時期，當屬李朝（李氏朝鮮）。[12]此外，他補充說道：

---

[7] 本文係引用自 1976 年之版本。見稻葉岩吉，《光海君時代の滿鮮關係》（東京都：国書刊行会，1976），頁 3-4。
[8] 稻葉岩吉，《朝鮮文化史研究》，頁 217。
[9] 稻葉岩吉，《光海君時代の滿鮮關係》，頁 247。
[10] 三品彰英，《朝鮮史概說》（東京都：弘文堂書房，1940），頁 2。
[11] 三品彰英，《朝鮮史概說》，頁 2-3。
[12] 三品彰英，《朝鮮史概說》，頁 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其權威中心之分立，或是由其中之一轉移到另一個的情況下，即鄰邦勢力變動之情況下，每每會在國內產生依存於並立之各勢力或新舊二勢力之主義、政策的對立。由此可見朝鮮特有之政爭，並顯現為歷史轉換的重大時期。以近世之例論，如崇明派與從清派、從清派與親日派、親日派與親露派與親米派等均屬之。因此，考察外國諸勢力之歷史，是理解朝鮮史所必須不可缺之前題。[13]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清楚了解在三品眼中，朝鮮歷史之發展，不過就是隨外國勢力擺盪而已。故他所舉例子，也集中於十七世紀中葉與十九世紀末等東亞國際秩序劇烈變動之時代。換言之，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前半葉，以及此前的十五、十六世紀的朝鮮史，被三品「技術性」忽略了。

此外，三品還認為這種「依據他律的權威而主張自我」的精神，除「缺乏獨立性」外，也造成當時之朝鮮人「人人相結」與「集中於權威下」、「結成黨閥」。[14]由此，他進一步指出，李朝五百年間，大部分之歷史皆是「非依於自己的生活意識，而是基於朱子學的原理、禮論所進行之一種依存的對立、沒有整體進展之時、無論何時都沒有意義、沒有任何結果的一種對立」的「朋黨政爭史」。[15]此即所謂的「黨派性論」或「黨爭亡國論」。

同時，三品更將朝鮮依附權威，特別是依附中華「典禮主義」的特點與尚武、征服之「滿蒙風土」對立，將朝鮮女性化，認為「半島風土」是「纖細而柔弱的」。是以與「滿蒙征服者」相較之下，朝鮮「的確是小中華」。[16]如此，吾人可見從稻葉岩吉到三品彰英，各提出了停滯性論、他律性論、半島性論與黨派性論等「朝鮮史特徵」。而這四種理論，便被視為所謂「殖民史觀的四根柱子」，成為戰後國史學界所批判與極欲克服的對象。[17]

---

[13] 三品彰英，《朝鮮史概說》，頁 7-8。

[14] 三品彰英，《朝鮮史概說》，頁 8。

[15] 三品彰英，《朝鮮史概說》，頁 9。

[16] 此處之「小中華」係貶意，與朝鮮史料中的「小中華」、今日中國學界所談之「小中華」各屬不同脈絡，並有不同含意。見後文「三、樹立主體性與弔詭地繼承」，並參照三品彰英，《朝鮮史概說》，頁 4-5。

[17] 此處「殖民史觀的四根柱子」語出韓國學者柱勝範。見계승범，〈조선시대 동아시아 질서와 한중관계-쟁점별 분석과 이해-（朝鮮時代東亞秩序與韓中關係——爭論點之個別分析與理解）〉，收入동북아역사재단編，《한중일 학계의 한중관계사 연구와 쟁점（韓中日學界之韓中關係史研究與爭論點）》（서울：동북아역사재단，2009），頁 132。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集大成的四方博：〈舊來の朝鮮社會の歷史的性格について〉

然而，戰前日本學者的韓國史觀並沒有隨著其戰敗而立即退潮。反之，由於韓戰爆發，一些日本學者反而更加相信自己當年的論斷確屬無誤，如三品彰英。而更有甚者，則在宣稱關懷朝鮮（朝鮮半島）未來之同時，繼承了這些舊說，並將之整理、發揚，如四方博。

三品彰英在 1957 年出版的《北鮮と南鮮》一書中，再次深化與強調了自己過去的朝鮮史觀點：朝鮮歷史的他律性與半島地理決定論。首先，一如該書名，他把朝鮮區分為北鮮與南鮮兩塊區域，並從國號上之異同來開展其朝鮮史論述。三品指出，南鮮今日所使用的「韓」，才是古代以降南方伽羅、斯盧等國之古語國名。相較之下，北鮮所使用的「朝鮮」，乃是出自中國史書《史記》等書之中國箕子傳說之語，該名之所以使用迄於朝鮮時代，乃是基於鮮人之「慕華思想」與「小中華」心理作祟。而韓末得重新使用「韓」一名，則是藉由日本之助；北鮮今日仍沿用「朝鮮」，正好顯示其乃中國（中共）宗屬之性質。[18]

再者，三品將朝鮮半島分為北鮮與南鮮，主要是為了凸顯朝鮮半島之歷史多由來自北方之力量所決定。包括原本三國中最強的高句麗、遼金元清之入侵，以及近代以降俄國勢力之介入等等。他認為，自新羅以降朝鮮便奉行對大國之事大主義政策，因此得以保國。然而，面對蒙古時，高麗朝武臣統治階層不能在慕華理想與現實主義中抉擇，遂致國亡。迨朝鮮時期時亦然，奉行崇明排金之一面倒政策，遂致光海君之廢位與三田渡之對清稱臣。而近代韓國皇帝之搖擺於日、露之間，亦可以過去朝鮮之於滿蒙之史實概觀。[19]從以上的論述可知，由於韓戰爆發與南北韓分裂，三品彰英遂以更「科學」、「實證」、自信之態度，闡明其所相信之朝鮮半島歷史特性：他律性、事大性與地理決定論。根據韓國學者李基白之說，當時藉機使「殖民史觀」復辟者不只三品，還包括和田清、岩井大慧、清山公亮與四方博。[20]

---

[18] 三品彰英，《北鮮と南鮮》（京都：ハ-バ一ド・燕京・同志社東方文化講習會，1957），頁 3-6。

[19] 三品彰英，《北鮮と南鮮》，頁 21-29。

[20] 李基白，〈近代 韓國史學에 대한 研究와 反省（關於近代韓國史學的研究與反省）〉，收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當屬四方博（1900-1973）。四方在 1951 至 1952 年的《朝鮮學報》上，連續發表了三篇名為〈舊來の朝鮮社會の歷史的性格について〉的文章。[21]該文共分為八部分，分別是「作為朝鮮歷史出發點的自然條件」、「民族國家生成過程下的半島的性格」、「作為國是的事大主義的成長」、「李朝社會『停滯性』之意義」、「貴族政權的存續與黨爭之禍」、「封建制之闕如與民生之阻礙」、「儒教主義對經濟活動之影響」與「開國前朝鮮之樣貌」等。僅就這八部份之標題而論，以此文為日本學界韓國史「殖民史觀之集大成」應不為過。

四方在〈舊來の朝鮮社會の歷史的性格について〉開頭中便宣稱，希望能有一個「有健全發展、令人刮目相看的獨立國朝鮮」。然而，他話鋒一轉，強調「新的朝鮮絕不會無中生有，必定會與舊來之朝鮮相連續，故必須從反省與革新過去的歷史上做起」，並申明該文的寫作動機為「傾向強烈批判舊朝鮮社會之黑暗面」。[22]換言之，該文旨在強調朝鮮半島歷史的黑暗面。

他首先論及朝鮮居於日本列島、滿蒙大陸與支那本部間的半島性。四方以為，朝鮮的半島地理性，使其自古以來便成為日本、滿蒙與支那本部等三大勢力的兵家必爭之地。然而，他又指出，朝鮮半島北邊山岳地帶，制約了外人流入的可能，導致半島缺乏不斷變動的經驗，並形成了一種穩定、靜謐的氛圍。而這種氛圍，在國家社會成形後，遂表現為「停滯與隱逸」。[23]這種既是諸勢力所垂涎之地，卻又同時「停滯與隱逸」的矛盾論述，皆可見於前述之稻葉岩吉與三品彰英之論。

四方博指出，正是因這種「半島的地理性」，使新羅必須藉唐兵之力來成就統一半島的大業，於是半島內部的問題不再是國內問題，而成為國際問題，並形塑了此後的日、支、鮮關係。[24]四方更進一步指出，這種「事大交鄰」的形式，是「非屬志於本國的發展」的一種「權謀數術」，並在朝鮮時代更為發揚——即以「事大」思想為國策。[25]同時，他也比較了朝鮮史上各時期的「事大」政策。

入氏著，《李基白韓國史學論集 2・韓國史學의 方向（李基白韓國史學論集 2・韓國史學的方向）》（서울：一潮閣，1997），頁 121-122。

21 四方博，〈舊來の朝鮮社會の歷史的性格について〉、〈舊來の朝鮮社會の歷史的性格について（二）〉、〈舊來の朝鮮社會の歷史的性格について（三）〉，《朝鮮學報》，1、2、3（天理市，1951-1952），頁 193-206、155-173、119-147。

22 四方博，〈舊來の朝鮮社會の歷史的性格について〉，頁 194-195。

23 四方博，〈舊來の朝鮮社會の歷史的性格について〉，頁 196-198。

24 四方博，〈舊來の朝鮮社會の歷史的性格について〉，頁 204-206。

25 四方博，〈舊來の朝鮮社會の歷史的性格について（二）〉，頁 155。

臺大學術特藏庫

四方以為，新羅藉支那本部之兵統一、以及高麗王朝頻頻向五代與遼、金、元等君主請求冊封者，其實都算是一種「自己保全」的政策。然而，進入朝鮮朝後便有所不同。他強調，李氏朝鮮無論是在形式、精神上，都對明朝採取完全之事大主義，以至於面對異民族清朝之支配時苦惱萬分、視日本為「島夷」、以自己為「小中華」，並感念於壬辰、丁酉時明朝的「再造藩邦」之恩。[26]

四方更把朝鮮對明朝的「信仰」，連結到了朝鮮於明亡後使用崇禎紀年、把清朝敕使稱為「清使」或「彼人」，認為這是朝鮮所行使的「消極的女性抵抗情感」。[27]同時，他還直接引用了三品對朝鮮禮論、黨爭之評價，認為這一切都與朝鮮政治家過度強調朱子學有關。[28]由此可見，四方徹底繼承了戰前稻葉岩吉與三品彰英的朝鮮史論述：包括將朝鮮「女性化」、他律性論、地理決定論、停滯性論與黨派亡國論。因此，「四方博」這個名字也就成為戰後韓國史學者所痛批之對象。[29]

三、樹立主體性與弔詭地繼承：關於光海君與仁祖的評價

由日本殖民史觀所建立的韓國史論述，不只深深影響了戰爭前後韓國的歷史學者，也成為近代韓國史學成立以來所極欲克服的命題。因此，它律性、停滯性、黨派亡國論、半島地理決定論等所謂「殖民史觀的四根柱子」，也就成為每一位韓國史學者所要超克的對象。而明清交替期的朝鮮歷史，即光海君、仁祖國王（1595-1649，1623-1649 在位）之際的史事，也正是殖民統治下日本學者攻擊朝鮮王朝盲目「事大」、「黨爭亡國」與歷史「他律」等論之來源所在。因此，如何重新看待、評價這一時期的朝鮮對外關係史，也成為排除殖民史觀遺毒的首要任務。

---

[26] 四方博，〈舊來の朝鮮社會の歷史的性格について（二）〉，頁 157-163。

[27] 四方博，〈舊來の朝鮮社會の歷史的性格について（二）〉，頁 164。

[28] 四方博，〈舊來の朝鮮社會の歷史的性格について（二）〉，頁 172-173。

[29] 李基白，〈近代 韓國史學에 대한 研究와 反省（關於近代韓國史學的研究與反省）〉，頁 122；金容燮，〈日帝官學者들의 韓國史觀（日帝御用學者的韓國史觀）〉，收入歷史學會編，《韓國史의 反省（韓國史的反省）》（서울：新丘文化社，1980），頁 36-39；姜晉哲，〈日帝 官學者가 본 韓國史의「停滯性」과 그 理論（日帝御用學者所見之韓國史之「停滯性」與其理論）〉，《韓國史學》，7（성남，1986），頁 203-211。

臺大學術期刊論文授權

（一）光海君肯定論與仁祖／西人集團否定論

如何克服日本學者的「它律性」指控，是 1945 年戰後韓國史學界所面對的核心問題。金容燮、李仁榮、李基白等學者亦紛紛撰文批判，並發展相關領域之實證研究，冀從各自研究領域上推翻此說。然而，對外關係史上確實存在之「事大」事實，卻又不容否認，成為了克服殖民史觀時的最大障礙。面對此一難題，第一種方法便是找出「反事大」的事例，說明韓國歷史之發展具有其主體性，而非假手於他人。而代表之事例，正是拒絕盲目對明事大、聯明抗清的光海君。

戰後首先讚揚光海君外交政策、闡明其重要性之韓國學者，屬李丙燾。他在 1959 年所寫之〈光海君之對後金政策〉(〈광해군의 대후금 정책〉)一文中，便將光海君評為「追求實用主義外交政策之君主」。[30]李氏以薩爾滸戰後朝臣要求連坐處分投降金國將帥姜弘立之家屬時，光海曾謂眾臣「卿等以此賊爲何如也？其以我國兵力有一毫可防之勢乎？自上年咨檄之來，予所憂慮者，非欲防徵兵之送」、「天朝若陳兵耀武，嚴守華夏之境，有如虎豹在山之勢，賊雖猖蹶，必不敢侮予矣」等語，盛贊光海君之英明。他寫道：

> 與眾臣無條件崇拜明朝及欲跟隨明朝方針之輕妄言論相比，王之所吐露者何其卓越與慎重。實可謂之深謀遠略。[31]

李丙燾在該文中詳述了當時光海君如何一面與努爾哈赤陣營交好，一面維持與明之關係，即所謂「兩端政策」（양단정책）。而這種兩端政策固然為朝鮮帶來了短暫的和平，卻也使光海自身陷入「背明」與「通虜」之漩渦中。當時在野之西人一黨，遂以此為口實之一，於 1623 年發動武裝政變，將光海君廢位。對此，李丙燾以「晴天霹靂」（청천벽력）來形容。[32]而其對後繼之仁祖政權之評論，亦與此相繫。在綜論光海君之功並與仁祖政府比較時，李氏有言：

30「왕은……국방과 외교에 있어서도 항상 용의주도한 시책을 강구 실행 하였던 것이다」。見이병도，〈광해군의 대후금 정책（光海君之對後金政策）〉，《국사상의 제문제（國史上之諸問題）》，1（서울，1959），頁 135。

31「무조건으로 명을 숭배하고 명의 방침에 추종하려하는 경망한 조신들의 언론과 비교하여 왕의 피력이 얼마나 탁월하고 정중한가. 실로 심모원책이라고 하겠다」。이병도，〈광해군의 대후금 정책（光海君之對後金政策）〉，頁 160。

32 이병도，〈광해군의 대후금 정책（光海君之對後金政策）〉，頁 17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介於險惡之明清兩國相鬥之間，有幸得免為後金鐵騎蹂躪之惠，係何人所施？若全非光海君之對金懷柔政策之結果，則孰令致之……若與僅高舉所謂「父母之邦」之義理並敵視後金、遂招來兩次胡亂之新政府斥和論者之誤國行為相較，孰是孰非更是顯而易見。[33]

由此可見，對李丙燾而言，不論光海君在內政、外交上有何處不妥，單以其在位期間能使朝鮮免於戰火，便已足夠。同時，高舉「對明事大」之仁祖政權，在其眼中也因「招來」兩次胡亂（指清太宗皇太極兩次入侵朝鮮之役，即 1627 年丁卯胡亂與 1636 年丙子胡亂），而顯得不足一論。這種肯定光海君之同時，猛烈批判仁祖及擁立其之西人一黨、乃至於彼等所持「崇明排金」價值觀之見解，係朝鮮後期所無。正確來說，是近代以降、甚至是戰後韓國史學界的產物，自此以降遂為主流學說。[34]

當然，此說也不乏批判之聲。首先是認為所謂「光海君密旨說」（即光海君下密旨指示姜弘立（1560-1627）主動投降後金）缺乏實據，因其只是相信政變主體西人所編纂之《光海君日記》，未對照時人之證詞；或即便參考了時人之記錄——如李民寏（1573-1649）〈柵中日錄〉，卻未將之與其文集《紫巖集》中的其他文章內容相對照，而僅僅採用自己需要之部分。論者指出，此舉將無助於釐清光海朝之外交政策爭論與當時之遼東問題。[35]

另一種批判是來自史料本身。現今流行光海君遭廢位之由，主要有兩點：即「廢母殺弟」與「背明通金」。然而，有學者以為這種說法完全忽略了《仁祖實錄》中所記載的光海君「七大罪狀」中的其餘五樣，包括濫用民力、賣官鬻爵、驅逐前朝大臣等，實在有欠公允。此外，這種看法還認為，依據《光海君日記》等史料所載，光海君在內政上腐敗不堪，幾乎毫無可取之處，如此昏君，又怎麼可能在外交上獨有建樹？因此，光海君的外交成就不過就是「機會主義

---

33 「금, 명 양국의 험악한 각축 사이에 개재하여 다행히 후금철기의 유린의 화를 면하게 된 것은 누구의 혜택이였던가. 이 것이 모두 광해군의 대금유화 정책의 결과가 아니고 무엇이냐. 소위「부모지방」의 의리만 내세우고 후금을 적대시하다가 양차의 호란을 초래한 신정부의 척화론자의 오국행위와 비교하면 숙시숙비가 더욱 선명히 드러날 것이다.」。이병도，〈광해군의 대후금 정책（光海君之對後金政策）〉，頁 172。

34 特別是後文所提及之韓明基將之發揚光大，成為現今韓國學界之主流論述，並進一步影響到相關戲劇、電影中所呈現的光海君形象。

35 고윤수，〈李民寏의 『紫巖集』과 17 세기 조선의 遼東문제（李民寏的《紫巖集》與十七世紀朝鮮之遼東問題）〉，《東北亞歷史論叢》，1：9（서울，2006），頁 127-12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的偶然成功」罷了。[36]換言之，這種說法即是站在「朝鮮王朝傳統立場」上，批判主流學說的過度詮釋，並幫仁祖及西人政權平反。[37]

第三種批判與前一種相似，主要針對與光海君之外交成就相對之所謂仁祖與西人政權「自招」兩次胡亂之說。這種批判認為該說忽略了清朝發動戰爭的本質——使朝鮮屈服。特別是丙子胡亂，根本乃清方欲變更兄弟之盟，逕自將之改為君臣關係——即片面撕毀盟約所導致。是以無法以此說明兩次胡亂乃仁祖政權「自招」所致。[38]同時，認為光海遭廢之主因為其破壞了朋黨政治之固有秩序、容許大北一派「一黨獨大」、違背自朝鮮建國之初奉為圭臬之性理學政治理想與其發展潮流等等。[39]然而，無論這三種批判有力與否，他們都承認，自李丙燾以降的「光海君肯定論與仁祖／西人否定論」，特別是其中所隱含之仁祖政府「崇明排清」政策係丙子胡亂根源之說，已成為主流看法；[40]甚至透過通俗歷史書籍，成為一般大眾的歷史認識。[41]

（二）他律性中的主體性：韓明基的研究與稻葉岩吉的命題

將李丙燾以來的「光海君肯定論」發揚光大者，當屬韓明基，他不只是肯定光海君靈活的外交手段，更將當時的朝鮮與明、清兩大勢力相聯繫，試圖從中重新賦予朝鮮能動性。

---

36 오항녕，〈내상과 외상을 넘어-인조시대 대내외 정책-（克服內傷與外傷——仁祖時代之對內外政策）〉，《한국불교사연구（韓國佛教史研究）》，4（서울，2014），頁 57。

37 該文作者오항녕也自認為自己的立場與朝鮮時代人相同。即「필자는 광해군에 대한 조선시대 사람들과 생각이 같다.」。見오항녕，〈내상과 외상을 넘어-인조시대 대내외 정책-（克服內傷與外傷——仁祖時代之對內外政策）〉，頁 43。

38 오수창，〈청과의 외교실상과 병자호란（與清之外交實像與丙子胡亂）〉，收入氏著，《조선시대 정치 틀과 사람들（朝鮮時代之政治框架與其人）》（춘천：한림대학교 출판부，2010），頁 52-55。

39 오수창，〈인조반정과 서인정권에 대한 논란（關於仁祖反正與西人政權之爭論）〉，收入氏著，《조선시대 정치 틀과 사람들（朝鮮時代之政治框架與其人）》，頁 19-21。

40 如韓國的朝鮮女真關係史相關作品中，也盛讚光海君之「洞察國際情勢」與「顧念民族之命運」。這些用辭與稻葉岩吉、李丙燾所云幾乎如出一轍。見金聲均，〈朝鮮中期의 對滿關係（朝鮮中期之對滿關係）〉，《白山學報》（천안，1978），頁 11。

41 고윤수，〈李民宬의 『紫巖集』과 17 세기 조선의 遼東문제（李民宬的《紫巖集》與十七世紀朝鮮之遼東問題）〉，頁 128；오항녕，〈내상과 외상을 넘어-인조시대 대내외 정책-（克服內傷與外傷——仁祖時代之對內外政策）〉，頁 43-44；오수창，〈청과의 외교실상과 병자호란（與清之外交實像與丙子胡亂）〉，頁 52-60。

臺大歷史學系圖書室

韓明基認為，光海君因為其在壬辰倭亂（即 1592-1597 年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之役）中的經歷，使其能獨具慧眼，甚至不惜與舉國臣僚對抗，只求能不出兵助明與捲入明清戰爭。[42]但光海君在內政上的缺失確實不可勝數，因此，他將這些作為解釋為光海為「強化王權」之手段，包括大興土木興建宮闕。[43]

而伴隨光海君肯定論之仁祖否定論，也不得不成為其主張之一。此中的代表作便是收錄其多年來研究成果的《丁卯、丙子胡亂與東亞》一書。該書於卷頭便痛批仁祖政權無能以至於向清太宗（1592-1643，1626-1643 在位）行三跪九叩、朝臣只顧高唱名分而未思考是否有條件加以實踐、仁祖本身於戰爭發生前既不知防備、發生後又僅僅是逃到江華島與南漢山城、致使大批百姓被擄，墜入痛苦深淵。[44]是以即便承認光海君在內政上的缺失，仍然不忘提醒讀者其外交政策上之慧眼，強調即便在今日亦可適用。[45]

但若僅是正面評價光海君，將會墜入稻葉岩吉的「滿鮮史」框架與「澤民主義論」、「他律性」論述中。[46]韓明基對此亦有所警覺，不斷在諸篇著作中提及此事。[47]因此，必須重新尋找能夠凸顯朝鮮自主性的事例；於是，比大陸勢力更宏觀的「東亞」視角，便成為了他所寄予之對象。

他在一篇 2011 年的研討會論文中，分析朝鮮的水軍在明清交替過程中的重要性。韓明基指出，壬辰倭亂期間，由於李舜臣（1545-1598）所率領的朝鮮水軍戰績卓著，以致於日後明、金兩大勢力對決時，都企圖爭取朝鮮加入己方。金國曾於 1630 年代初向朝鮮借舟攻打皮島，遭朝鮮拒絕且吃下了敗仗；迨 1637 年以降成功動員了朝鮮水軍後，情況遂有不同。因此，韓氏以為，朝鮮水軍在

---

42 韓明基，〈光海君代의 對中國 관계（光海君朝之對中國關係）〉，《진단학보（震檀學報）》，79（서울，1995），頁 132-133。

43 韓明基，〈光海君代의 對中國 관계（光海君朝之對中國關係）〉，頁 133；韓明基，〈폭군인가 현군인가 광해군 다시 읽기（暴君抑或明君？再讀光海君）〉，《역사비평（歷史批評）》，44（서울，1998），頁 224。

44 한명기，《정묘・병자호란과 동아시아（丁卯・丙子胡亂與東亞）》（서울：푸른역사，2011），頁 4-7。

45 한명기，〈광해군-외교의 '빛'과 내정의 '그림자'-（光海君——外交上之「光輝」與內政上之「陰影」）〉，《한국사시민강좌（韓國史市民講座）》，31（서울，2002），頁 78。

46 稻葉岩吉，《光海君時代の滿鮮關係》，頁 1-4、247-248。

47 韓明基，〈光海君代의 對中國 관계（光海君朝之對中國關係）〉，79，頁 94；韓明基，〈16, 17 세기 明淸交替와 한반도-'再造之恩', 銀, 그리고 쿠데타의 변주곡-（16、17 世紀明清交替與韓半島——「再造之恩」、銀與政變的變奏曲）〉，《明清史研究》，22（서울，2004），頁 39。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七世紀明清交替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48]而事實上，金國一直到孔有德（？-1652）等人投降後才獲得水軍與駕馭紅夷大砲的能力，故此說不無道理。

除此之外，仁祖反正的歷史意義也需重新評價，如此才能賦予十七世紀朝鮮自主性與能動性。而其具體之作業，便是仁祖反正與明朝的「虛擬的支配力」（의제적 지배력）。韓明基認為，壬辰倭亂時明出兵朝鮮的「再造之恩」，已經讓朝明關係脫離傳統「朝貢－冊封」框架，使明朝對朝鮮「虛擬掌握力」（擬制的 장악력）大增。[49]然光海君即位後，由於不願捲入金、明對決的泥沼中，故不僅影響了薩爾滸戰局，更拒絕明朝此後的增兵要求，使明朝的虛擬掌握力下降。就在明、金對決白熱化之際，朝鮮發生了光海君廢位與仁祖反正，於是便對明交替發生了重大影響。[50]

韓氏指出，原本許多明朝大臣認為仁祖是「篡奪」，應興兵討伐，但因明、金對戰情勢日益升溫，最後乃決意命朝鮮與毛文龍共同滅虜，並承認仁祖之「反正」、准其襲封朝鮮國王。於是，明朝得藉此重新運用朝鮮，並恢復了對朝鮮「虛擬的支配力」（의제적 지배력）。[51]由此，一個朝鮮國內的政變，以及一位須要透過明朝冊封的篡位者，便具有了影響東亞國際秩序的能動性。

但這種論述本身卻隱含了一種危機：形同承認當時朝鮮之歷史深受明、金等大陸勢力所牽制。換言之，在描述仁祖反正如何改變了光海君時期以來的東亞國際局勢之同時，由於反正高舉之口號與當時明清對決之態勢，朝鮮反而更加陷入泥淖中而不可自拔，如此實無異於承認了稻葉岩吉以來所定下的「他律性論」烙印。就歷史研究的角度而言，如此實屬無可厚非，畢竟研究應該以史料為出發點，而非意識形態或特定史觀。而或許正是因為韓明基多年來嚴謹與

---

48 詳見韓明基，〈壬辰倭亂，明清交替와 朝鮮 水軍(壬辰倭亂、明清交替與朝鮮水軍)〉，宣讀於「海戰與東亞世界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2011.9。

49 韓明基，〈16, 17 세기 明清交替와 한반도-'再造之恩', 銀, 그리고 쿠데타의 변주곡-（16、17 世紀明清交替與韓半島——「再造之恩」、銀與政變的變奏曲）〉，頁 42-43。

50 韓明基，〈16, 17 세기 明清交替와 한반도-'再造之恩', 銀, 그리고 쿠데타의 변주곡-（16、17 世紀明清交替與韓半島——「再造之恩」、銀與政變的變奏曲）〉，頁 52。

51 韓明基，〈16, 17 세기 明清交替와 한반도-'再造之恩', 銀, 그리고 쿠데타의 변주곡-（16、17 世紀明清交替與韓半島——「再造之恩」、銀與政變的變奏曲）〉，頁 54-55；한명기，〈조중관계（朝中關係）의 관점에서 본 인조반정（仁祖反正）의 역사적 의미 -명（明）의 조선에 대한 "의제적（擬制的）지배력（支配力）"과 관련하여-（從朝中關係的觀點看仁祖反正的歷史意義——關於明對朝鮮的「虛擬的支配力」〉，《南冥學研究論叢》，16（진주，2011），頁 273。

深入之研究，讓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其對他律性論的看法。在一篇文章的摘要中，他提到：

> 由於壬辰倭亂，朝明關係脫離了正常的「朝貢－冊封」關係。明軍之參戰，使明之干涉日甚，朝鮮之自主性也由是受損。身處於危機的朝鮮統治階層，將明之參戰頌揚為「再造之恩」；而明朝在努爾哈赤勢力成長後，隨即欲以「以夷制夷」之手段加以利用朝鮮。要言之，再造之恩制約了明清交替期朝鮮的外交空間……若考慮夾於中日間的朝鮮於元明交替、明清交替時所經歷之殘酷歷史經驗，我們將深切地認識到為克服朝鮮半島之弱體性（약체성）而努力是何等之重要。[52]

由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韓明基感慨朝鮮自主性深受元、明、清，甚至日本等勢力影響，而類似的論點早於 2004 年時便已提出，差別只在當時尚未論及元明交替時的朝鮮。[53]此外，上述文字中最關鍵者，當屬「弱體性（약체성）」一詞。該詞彙為「弱體（약체）」與「性（성）」二詞彙所構成之韓文漢字詞。而弱體（약체）之意義，指的是「脆弱的身體、組織體、體制」或「實力與能力脆弱的組織體」。[54]由此，弱體性應可理解為中文之「脆弱性」。若依照此段引文之前後文脈絡，加以考慮韓明基歷來研究成果，這一「朝鮮半島的弱體性」或「朝鮮半島的脆弱性」，當指使「自主性受所損」之「他律性」。而這種將「他律性」改稱為「弱體性」之作法，亦見於《丁卯、丙子胡亂與東亞》的序言之中。[55]若如韓氏所自稱，2009 年出版之該書為其 2002 年以降研究之總整理，那

---

52 「임진왜란을 계기로 조명관계는 정상적인 '책봉-조공'체제에서 이탈했다. 명군의 참전을 계기로 명의 간섭이 심해졌고 조선의 자주성은 훼손되었다. 위기에 처한 조선지배층은 명군의 참전을 '재조지은'으로 숭앙했고 왜란 이후 누르하치가 성장하자 조선을 이이제이를 위한 수단으로 활용했다. 요컨대 재조지은은 명청교체기 조선의 외교적 행보를 제약했다..... 중일 사이에 끼여 있는 조선이 원명교체, 명청교체기에 겪었던 엄혹한 역사적 경험을 고려하면 한반도의 약체성을 극복하려고 노력하는 것이 얼마나 중요한 과제인지를 새삼 절감하게 된다.」。한명기，〈원명교체, 명청교체와 한반도(元明交替、明清交替與韓半島)〉，《세계정치(世界政治)》，30：2（서울，2009），頁 62。

53 韓明基，〈16, 17 세기 明清交替와 한반도-'再造之恩', 銀, 그리고 쿠데타의 변주곡-（16、17 世紀明清交替與韓半島——「再造之恩」、銀與政變的變奏曲)〉，頁 62。

54 李熙昇，《민중 국어 대사전（民眾國語大辭典)》（서울：民眾書館，1961），頁 1951；韓國國立國語院標準國語大辭典（국립국어원 표준국어대사전）http://stdweb2.korean.go.kr/search/View.jsp(2015/03/21)。

55 한명기，《정묘・병자호란과 동아시아（丁卯・丙子胡亂與東亞)》，頁 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麼這將近十年來的研究成果，反倒更加深其對朝鮮半島「弱體性」（即「主體性不足」或「他律性」）之認識。

換言之，為了樹立朝鮮主體性與能動性，韓明基選擇將十七世紀朝鮮的歷史相與明清交替連結。然而，在連結之後，卻反倒無法全面否認朝鮮歷史的弱體性或他律性。因此，吾人可謂韓明基既批判、卻也繼承了稻葉岩吉的研究成果；而其所賦予當時朝鮮的主體性，算是一種成立在他律性基礎上的主體性。

（三）《朝鮮時代海外派兵與韓中關係》：桂勝範的思路與方法

相較於韓明基繼承李丙燾以來肯定光海君、批判反正西人政權之看法，桂勝範則提出了不同的見解。他指出，當時反對光海君「一意孤行」對後金政策者，不僅僅是西人派，尚包括掌權之大北派、小北派以及與南人派等在野勢力交好的人士。換言之，提出「排金論」之人，並非僅止於西人與南人，而是整個朝鮮士大夫統治階級。因此，桂氏認為，在當時的環境下，排金與對明事大其實是一種國家認同層次的問題，這才導致光海君之廢位。[56]換言之，桂勝範已經跳脫了「北人－西人」、「事大－反事大」的解釋框架，重新賦予了「對明事大」新的意義——如今日的「國家認同」。既然不否定具有他律特徵的事大，那麼，他又要如何尋找朝鮮時代史（特別是十七世紀朝鮮對外關係史）的主體性呢？

他選擇從朝鮮時代的「海外派兵」經驗談起，代表作便是《朝鮮時代海外派兵與韓中關係：朝鮮統治階級的中國認識》（以下簡稱《朝鮮時代海外派兵與韓中關係》）。[57]在《朝鮮時代海外派兵與韓中關係》一書中，桂勝範考察了自明正統（1436-1449）迄清康熙年間（1662-1722）朝鮮派兵與中國共同作戰之諸事例，並比較了不同時空下派兵之背景與性質。桂氏指出，朝鮮世宗（1397-1450，1418-1450 在位）拒絕了正統年間與明共征瓦剌之要求，顯示朝鮮在事大與國家利益中，選擇了後者；而朝鮮世祖（1417-1468，1455-1468 在位）之所以於成化三年（1467）即刻出兵與明朝合攻建州女真，一方面係其原本便已

56 계승범，〈광해군대 말엽(1621-1622) 외교논쟁의 실제와 그 성격（光海朝末葉〔1621-1622〕外交路線論爭之實像與其性質）〉，《역사학보（歷史學報）》（서울，2007），頁 6、32-33。

57 계승범，《조선시대 해외파병과 한중관계：조선 지배층의 중국인식（朝鮮時代海外派兵與韓中關係：朝鮮統治階級的中國認識）》（서울：푸른역사，2009）。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醞釀討伐建州衛，一方面則為緩和因女真問題而日趨矛盾之明、鮮關係所致；而朝鮮成宗雖參與了成化十五年（1479）之再次與明夾擊建州之役，卻是先觀望、後派兵與藉故拖延會師之時日，並經歷了朝中許多討論、權衡後之決定，並非「盲目遵從」明之旨意。因此，桂氏以為至少在十五世紀時，朝鮮僅僅將明朝視為與自己比鄰之超級大國，而並未事之如父母。[58]

至於朝鮮事大觀之轉變，桂勝範以為需待進入十六世紀朝鮮中宗時期才真正有所不同，論據係《朝鮮王朝實錄》中關於明朝為「父母之國」、明朝之所做所為乃「父母之恩」等用例數量與出處之變化。桂氏指出，在十六世紀以前，雖也不乏稱明朝為「父母」或歌頌其「父母之恩」之記錄，然皆僅見於外交文書中，由此可見其目的性與戰略性；而十六世紀以降，「父母之國」與「父母之恩」等概念已進入一般朝鮮內政之討論中，可見此時期「小中華」之世界觀與對明事大之概念，已深入朝鮮士大夫統治集團之心中。[59]由此，桂氏進一步指出，儘管光海君朝大臣主張派兵助明確實與感念壬辰倭亂時明之「再造之恩」有關，其觀念上之來源，係自朝鮮中宗時期便已確立。[60]

事實上，類似的觀點已可見於桂勝範 2006 年之論文中，[61]之所以以海外派兵為視角研究朝鮮對明觀之變化，實際上應係回應兩大經典學說：即壬辰倭亂之「再造之恩」與殖民史觀之他律性論。桂氏雖未言明「再造之恩」之論者，然該說係韓明基所力倡，故此論應可視為其對韓明基學說之反駁。[62]而以十五

---

58 계승범，《조선시대 해외파병과 한중관계：조선 지배층의 중국인식（朝鮮時代海外派兵與韓中關係：朝鮮統治階級的中國認識）》，頁 113-116。

59 계승범，《조선시대 해외파병과 한중관계：조선 지배층의 중국인식（朝鮮時代海外派兵與韓中關係：朝鮮統治階級的中國認識）》，頁 139-145。

60 계승범，《조선시대 해외파병과 한중관계：조선 지배층의 중국인식（朝鮮時代海外派兵與韓中關係：朝鮮統治階級的中國認識）》，頁 145。

61 계승범，〈파병 논의를 통해 본 조선전기 대명관(對明觀)의 변화（從派兵議論看朝鮮前期對明觀之變化）〉，《大東文化研究》，53（서울，2006），頁 309-346。

62 韓明基於 1995 年之文章中便指出，報答明之「再造之恩」已成為光海君朝不可避免的外交課題，並成為日後仁祖反正之口實。其於 1997 年之博士論文中再次強調再造之恩的影響力，而其後著述中也皆可見「再造之恩」之蹤影。2007 年，韓明基於《大東文化研究》上發表了〈재조지은(再造之恩)과 조선후기 정치사 -임진왜란~정조대 시기를 중심으로（再造之恩與朝鮮後期政治史——以壬辰倭亂至正祖朝時期為中心）〉一文，強調「再造之恩」在十七世紀造成了王權交替，而迄十八世紀以降，則成為朝鮮肅宗、正祖、英祖等三位國王強化其王權之工具，說明「再造之恩」於朝鮮後期政治史上之重要性與影響力。由此，該文應可視為對 2006 年桂勝範反駁之回應。詳見韓明基，〈光海君代의 對中國관계（光海君朝之對中國關係）〉，頁 93-134；韓明基，《宣祖代 후반~ 仁祖代 초반 對明

至十六世紀朝鮮政府對於派兵與否之態度轉變與統治階級對明觀之變化說明光海君朝之爭議時，則可突顯朝鮮歷史之內在主動性——即朝鮮之事大觀表面上雖大同小異，實際上卻有不同轉折。如此一來，則可一舉去除他律性論之陰影，並毋須爭辯事大之合理與否。

除了藉此樹立朝鮮史的主體性外，桂勝範也不忘與高舉他律性大旗的日本殖民史觀御用學者正面對決。如前文所述，自稻葉岩吉以降，皆云壬辰、丁酉二亂將明朝捲入七年之大戰中，消耗了朝鮮與明之軍事、財政實力，致使女真人得以乘機興起。桂氏在一篇文章中反擊了這一論點。

桂勝範統計了努爾哈赤時期的建州部軍事活動相關記錄後指出，其勢力膨脹時期有二：一在 1589 年以前，一在 1599 年之後。而倭亂爆發之 1592-1597 年間，除 1593 年對抗海西女真與蒙古聯軍入侵外，努爾哈赤不僅沒有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反而積極試圖與朝鮮建立外交關係，呈現出鮮明之防禦姿態。[63]由此，他認為所謂的「壬辰倭亂造成了明清交替」（他律性論常援以為據）之說，無論表面上如何合理，實際上都缺乏證據，難以成立。如此，他再度粉碎了他律性論的重要論據之一。

然而，「再造之恩」一說確實普遍存在於十七世紀以降朝鮮士大夫的言論與文集中，是以此論或可補充「再造之恩」宏大敘事的不足之處，卻也難以撼動此說。同時，此種作法正好凸顯了其強調朝鮮朝歷史主動性之意圖。身為韓國人與韓國史學者，有此關懷與目的也並無不妥，然此種「強調朝鮮朝歷史主動性」之作法，實際上與其過去所批判的過度強調事大合理性之「內在的發展論」內在邏輯並不相悖。[64]換言之，即便批判盲目追求「內在的發展」，在它律性論餘毒未清之下，也不得不走向「內在的發展」這條路上。同時，這也代表了桂勝範與韓明基的殊途與同歸。前者在批判殖民史觀他律性論之同時，藉由

關係 研究（宣祖後期至仁祖初期對明關係研究）》（서울：서울大學校國史學科文學博士論文，1997），頁 33-43；韓明基，〈재조지은（再造之恩）과 조선후기 정치사 -임진왜란~정조대 시기를 중심으로（再造之恩與朝鮮後期政治史——以壬辰倭亂至正祖朝時期為中心）〉，《大東文化研究》，59（서울，2007），頁 191-230。

63 계승범，〈임진왜란과 누르하치-동아시아의 새로운 패자, 누르하치의 시각에서 본전쟁（壬辰倭亂與努爾哈赤——東亞新霸者努爾哈赤眼中所見之戰爭）〉，收入정두희、이경순編，《임진왜란： 동아시아 삼국전쟁（壬辰倭亂：東亞三國之戰）》（서울：휴머니스트，2010），頁 362-380。

64 계승범，〈조선시대 동아시아 질서와 한중관계-쟁점별 분석과 이해-（朝鮮時代東亞秩序與韓中關係——爭論點之個別分析與理解）〉，頁 133-13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元明交替、明清交替乃至東亞國際秩序變動等具有「他律」特徵之框架，再次賦予了此時期朝鮮王朝之存在意義、能動性與主體性；後者則在批評「內在的發展論」之同時，也藉由「派兵－對明觀之變化」這一「內在發展」之理路，說明了朝鮮王朝於中國明朝時期之對外政策與朝鮮統治階級對明態度之轉變，重新給予朝鮮王朝歷史之主體性與能動性。因此，透過韓、桂兩位之研究，吾人可謂直至今日，在十七世紀中韓關係史研究上，為掃除他律性論之遺毒，韓國學界呈現著一顯著特徵：走在主體性與他律性之間。

四、超克殖民史觀的新嘗試：從小中華到朝鮮中華主義

在戰前日本學者眼中，「事大」與「小中華」是朝鮮歷史喪失主體性與陷於停滯之關鍵。因此，他們不斷強調小中華之於朝鮮王朝的意義，藉此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統治。因此，事大與中華思想，乃至於尊明思想，遂成為韓國史學界必須面對的課題。於是，「朝鮮中華主義論」於焉登場，並在韓國學界掀起不小的論戰。

（一）「小中華」與「朝鮮中華主義」：主體性與韓國史「內在的發展論」

「朝鮮中華主義論」指的是自明亡以後，朝鮮統治階層便不再以「小中華」自居，改而自命為「中華文明之繼承者」；並以此為綱領，重整兩亂（壬辰倭亂、丙子胡亂）以後朝鮮政治、社會、經濟秩序，帶領國家再起，成為東亞「文化中心國」。換言之，在「朝鮮中華主義論」框架下，朝鮮不再是依附大中華的小中華，而是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自尊意識、自我認同、具有主體性、「內在的」且「發展的」「朝鮮中華主義」思想。[65]其代表論者為鄭玉子與其學生禹景燮。

事實上，這種強調朝鮮歷史中「內在的」、「發展的」特質的研究傾向，最早

[65] 反對此論者則繼續使用「小中華」（소중화）一詞。見계승범，《정지된 시간：조선의대보단과 근대의 문턱（靜止的時空——朝鮮的大報壇與近代的門檻）》（서울：서강대학교출판부，2011），頁 264。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以追溯至 1960 年代。當時的韓國史學界為了克服日本殖民史觀下的停滯性論與他律性論，開始強調應該要積極發掘韓國史「內在的」、「發展的」特質。[66]於是，包括李基白在《韓國史新論》中以「社會統治勢力的變遷」重新樹立韓國史之體系、以及姜萬吉、金容燮分別討論朝鮮後期的工匠階層／工業發展、農業／農民階層之發展、兩班數目之氾濫與身分秩序之動搖等所架構之「資本主義萌芽論」等，皆於焉登場。而這一以韓國史尋找「內在的」、「發展的」特質以克服日本殖民史觀的韓國史研究框架，於 1980 年代後被統稱為「內在的發展論」。[67]「內在的發展論」原本多集中於經濟史，後來逐漸擴散到思想史、法制史等各領域，可說是引領一時風騷。[68]然而，隨著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衰弱與後現代史學之繼起，「一國史」理解框架也漸漸式微。而以鄭玉子為首的「朝鮮中華主義論」，也多少受此框架與研究風氣所影響。

鄭玉子在《朝鮮後期朝鮮中華思想研究》指出，同時身兼東亞文化中心與東亞國際秩序中心的明朝滅亡後，朝鮮便以自己為中華文化守護者之姿，繼承中華文化。因此，朝鮮本於建國之初將自身定位為「小中華」，此後則轉換為「朝鮮中華意識」，而「朝鮮中華主義」也於焉成立。[69]

基於「朝鮮中華主義」成立於明亡之後，鄭氏更將「朝鮮後期」定於仁祖反正發生的 1623 年，理由在相較於過去雖盛行以壬辰倭亂、丙子胡亂等兩亂以降為朝鮮後期，他以為更應尋找戰爭以外、導致社會全盤轉變的「內在要因」。而發動仁祖反正的主體屬純粹性理學派之西人政派，故鄭氏認為以彼等掌權之始為朝鮮後期的設定較為合理；而「朝鮮中華主義」便是彼等所持之大義名分，直至甲午更張。[70]由上述的論述，清晰可見他欲重新尋找韓國史「內在的發展因素」的傾向。故若謂鄭玉子之說屬於韓國史「內在的發展論」框架下的代表作之一，似乎亦不為過。

但此種以朝鮮中華為兩亂以降恢復社會秩序、時代精神的論述，自然必須

---

66 金容燮，〈日帝官學者들의 韓國史觀（日帝御用學者的韓國史觀）〉，頁 37。

67 이영호，〈'내재적 발전론' 역사인식의 궤적과 전망（「內在的發展論」歷史認識的軌跡與展望）〉，《韓國史研究》，152（서울，2011），頁 244-255；강만길，《역사가의 시간：강만길 자전서（史家的時光：姜萬吉自傳回憶錄）》（파주：창비，2010），頁 166-178。

68 이천창，〈한국사 파악에서 내재적 발전론의 문제점（韓國史理解脈絡下內在的發展論之問題）〉，《한국사시민강좌（韓國史市民講座）》（서울，2007），頁 1-8。

69 鄭玉子，《조선후기 조선중화사상 연구（朝鮮後期朝鮮中華思想研究）》（서울：一志社，2001），頁 17。

70 鄭玉子，《조선후기 조선중화사상 연구（朝鮮後期朝鮮中華思想研究）》，頁 1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面對「韓末何以亡國」這一難題。因此，鄭氏將十八、十九世紀以降新興的北學思想、勢道政治之當權派、開化派等，與逐漸式微、淪為在野士人中心思想的朝鮮中華思想相對立。鄭氏認為朝鮮中華思想雖有其限制，但自十七世紀以來所建立之「時代精神」已深深扎根於士人心中，於是乃有韓末風起雲湧的抗日義兵運動。反之，朝鮮或大韓帝國亡於日本，乃是從北學派、開化派乃至於「親清」當權派，逐漸與在野儒林與彼等所持之中華思想、文明精神脫離之故。[71]換言之，在鄭玉子眼中，「朝鮮中華」或「小中華」不再是恥辱的亡國印記，反倒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極具意義的思想體系；而開化派等卻一反而成為亡國之妖孽。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事實上，鄭玉子在寫這本書時有極強烈的現實關懷。其在序言與結論中都不斷提到，20 世紀初以降，韓國經歷淪為殖民地、韓戰等殘酷至極、民族相殘的歷史經驗，也曾嚮往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文明與厲行西化——追求西方科學技術文明、資本主義、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等信條，卻不幸遭逢國家破產、為 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接管，故應適時重新思考失去的民族認同、並從傳統中得到新的啟發。[72]因此，相較於一般研究者肯定北學論、開化派並批判帶有事大主義（即他律性）色彩的朝鮮中華思想，鄭玉子則認為必須還其本來面目，因為歷史並不如「內在的發展論」所示之「機械式與按階段所進行」，而是充滿曲折。[73]然而，為何要賦予朝鮮中華主義全新之歷史意義，其內在理路仍值得仔細推敲。鄭氏在《朝鮮後期朝鮮中華思想研究》結論中的一段話或可作為參考。其言：

> 本研究以梳理朝鮮期時代精神之方式，取得克服殖民史觀之階段性成果，特別是針對那些反覆出現於不知所以然的情緒反應或各種片面之論者，並試圖將此課題徹底解決。[74]

換言之，之所以選擇突顯朝鮮中華思想，且將之視為朝鮮（後期）之時代精神，並批判北學派、開化派、甚至是「親清」勢道政治當權派之說，仍是為了克服

---

71 鄭玉子，《조선후기 조선중화사상 연구（朝鮮後期朝鮮中華思想研究）》，頁 281-282。

72 鄭玉子，《조선후기 조선중화사상 연구（朝鮮後期朝鮮中華思想研究）》，頁 3、284-285。

73 鄭玉子，《조선후기 조선중화사상 연구（朝鮮後期朝鮮中華思想研究）》，頁 184-187。

74 「이 연구는 조선시대의 시대정신을 밝힘으로써 막연한 감정적 대응이나 각론에서만 맴돌던 식민사관에 대한 극복작업에서 한단계 진전하여 원천적인 해결을 의도하였다.」。鄭玉子，《조선후기 조선중화사상 연구（朝鮮後期朝鮮中華思想研究）》，頁 279。

臺大學術期刊資訊庫

殖民史觀（停滯性、它律性）之所為。是以鄭氏雖然批判「內在的發展論」這一研究框架，然其正面評價朝鮮中華主義之立場，多少亦離不開「內在的發展」之視野。[75]

深受業師鄭玉子影響的禹景燮則進一步發展出了下列論述。在 1659 年主張北伐之朝鮮孝宗（1619-1659，1649-1659 在位）過世，及 1662 年南明永曆帝（1623-1662，1646-1662 在位）被擒後，由於「北伐」與復興明室之機會渺茫，朝鮮大儒宋時烈（1607-1689）乃藉由儒家治亂循環之理論，將明亡視為周室之亡，並以朝鮮為中華文明之唯一繼承者——即朝鮮中華主義遂成立於斯時。[76]

禹氏舉有以下三例以闡述其說：宋時烈對乙支文德（？-629）之評價、對衣冠與風俗之重視、供奉崇禎帝（1611-1644，1627-1644 在位）之御筆。乙支文德係抵抗隋煬帝（569-618，604-618 在位）入侵之大將，若本春秋大義，應予以貶斥。然宋時烈卻盛贊其反抗了「泯滅天禮人倫的隋煬帝」，故禹景燮以為此乃朝鮮超越慕華、邁向文化中華之象徵。[77]宋時烈之主張使用中原之襴巾與平頂巾，以及將父母排位上寫有「顯」字之「胡俗」去除，都是其欲繼承中華文化表徵。[78]最後，供奉朝鮮使臣於北京所購得之一支名為「非禮不動」的崇禎皇帝御筆，宋時烈本人為之作跋，並盛讚崇禎以「國亡身死」實現了「禮」，顯示朝鮮已正式繼承了中原、中華文化。[79]

「朝鮮中華主義」這一明亡後朝鮮為中華唯一繼承者之論述，從鄭玉子於 1998 年提出以降，便遭受了不少批評。而繼承此說之禹景燮自然也不能免。對此，他在〈朝鮮中華主義에 대한 학설사적 검토〉（〈關於朝鮮中華主義之學說

---

[75] 桂勝範便將朝鮮「朝鮮中華（主義）論」與「真景文化論」、「朋黨政治論」、「資本主義萌芽論」等歸入「內在的發展」視角之研究成果。見계승범，〈15~17 세기 동아시아 속에 조선（15~17 世紀東亞中的朝鮮）〉，收入이익주編，《동아시아 국제질서 속의 한중관계사：제언과 모색（東亞國際秩序中的韓中關係史：提案與摸索）》（서울：동북아역사재단，2010），頁 255。

[76] 禹景燮〈宋時烈의 華夷論과 朝鮮中華主義의 성립（宋時烈的華夷論與朝鮮中華主義的成立）〉，《진단학보（震檀學報）》，101（서울，2006），頁 275-282。

[77] 禹景燮〈宋時烈의 華夷論과 朝鮮中華主義의 성립（宋時烈的華夷論與朝鮮中華主義的成立）〉，頁 281-282。

[78] 禹景燮〈宋時烈의 華夷論과 朝鮮中華主義의 성립（宋時烈的華夷論與朝鮮中華主義的成立）〉，頁 282-283。

[79] 禹景燮〈宋時烈의 華夷論과 朝鮮中華主義의 성립（宋時烈的華夷論與朝鮮中華主義的成立）〉，頁 283-285；우경섭，〈'再造藩邦'에서 '非禮不動'으로：바위에 새겨진 명나라에 대한 두 가지 기억（從「再造藩邦」到「非禮不動」——石巖上的兩種明朝記憶）〉，《한국학연구（韓國學研究）》，28（인천，2012）頁 19-20。

臺大歷史期刊資料庫

史的檢討〉）一文中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禹氏以為，目前批判「朝鮮中華主義論」者主要可分為兩類：認為「朝鮮中華主義論」論者對「中華」之概念與內涵理解有誤、以及「朝鮮中華主義論」所包含之認同問題。前者係指「朝鮮中華主義論」論者過度強調「中華」概念中的文化要素，刻意忽略了種族與地域這兩個朝鮮不可能成為中華的因素；後者則是質疑所謂「朝鮮中華主義」到底是「朝鮮的中華化」還是「中華的朝鮮化」——即認為「朝鮮中華主義」為一無法擺脫「崇明」陰影的表徵。[80]

對此，禹景燮以為中華之概念雖同時兼有文化、地域、種族等要素，但孟子以降皆以文化、王道與德為正道，故強調文化層面之「中國」與對其之「繼承」，才是當時東亞儒教文化之精髓。因此，所謂的中華概念問題，在其看來不過是「為何不以現代世界之地域、種族」等加以考慮之翻版。[81]如此，禹氏更以朝鮮王朝士人批判陽明學、明朝過強的皇權與宦官制度等，認為「不能把中原王朝的全部」都「視為中華文物」——即「中華不等於中原王朝」，並以此回應了所謂朝鮮中華主義之認同問題。[82]

換言之，在禹景燮眼中，朝鮮中華主義雖崇尚外來文化，但這個文化是當時東亞文化的精髓，而非專屬於中原王朝本身。加以朝鮮本身並未全盤接受明朝文化（如陽明學、宦官制度），故這一具有「認同疑慮」、「他律」特徵的價值觀，便一轉而為具有獨創性、自主性、主體性之思想體系。他以為認同問題與概念問題等質疑，不過是對過去人加以「二十世紀之批判」，且「並非歷史之思維」。[83]

然而，其師鄭玉子亦承認朝鮮中華主義這一思想體系，實際上含有恢復朝鮮受挫之自尊心與自我療癒，重新鞏固朝鮮內部文化政治基礎之效。[84]意即朝鮮中華主義實際之內在意義，亦不容忽視。對此，禹氏並未加以著墨。是以相

---

80 우경섭，〈朝鮮中華主義에 대한 학설사적 검토（關於朝鮮中華主義之學說史的檢討）〉，《한국사연구（韓國史研究）》，159（서울，2012），頁 245-247、250-251。

81 우경섭，〈朝鮮中華主義에 대한 학설사적 검토（關於朝鮮中華主義之學說史的檢討）〉，頁 246-247。

82 우경섭，〈朝鮮中華主義에 대한 학설사적 검토（關於朝鮮中華主義之學說史的檢討）〉，頁 253-254。

83 우경섭，〈朝鮮中華主義에 대한 학설사적 검토（關於朝鮮中華主義之學說史的檢討）〉，頁 258。

84 鄭玉子，《조선후기 조선중화사상 연구（朝鮮後期朝鮮中華思想研究）》，頁 17-18；鄭玉子，〈正祖代 對明義理論의 整理作業-〈尊周彙編〉을 중심으로-（正祖時期對明義理論的整理作業——以〈尊周彙編〉為中心）〉，《韓國學報》，18（서울，1992），頁 78。

臺大博碩論文資料庫

較之下，禹景燮對朝鮮中華主義之辯護，看似鏗鏘有力，卻又有些不足。而這不足之感，則暗示了其捍衛朝鮮中華主義的意圖：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朝鮮時代思想之主體性，不容解構與質疑。

（二）時空錯置、認同錯亂：來自韓國學界內部的批評

但這種以「朝鮮中華主義」代替「小中華」以彰顯朝鮮王朝具有「內在的」且「發展的」等性質的做法，其實自其萌芽之始便飽受各方之批判。首先登場的是基於民族主義史學傳統與代表韓國民間史學派（即不屬於學院出身，但影響力極大）論述的大將李離和。

李離和的〈北伐論의 思想史的 檢討〉(〈北伐論之思想史檢討〉，以下簡稱〈北伐〉) 一文便屬代表之作。此處之「北伐」係指朝鮮孝宗時期為「恢復明朝」之北伐構想，也是強調小中華／朝鮮中華主義學者的主要論據之一。該文開頭便批判了其時（1975）少壯學者所謂「為擺脫殖民史觀與停滯性理論」所做「復古的」、「懷古的」歷史解釋。[85]李氏以為，這些少壯學者居然將金富軾以降依附於外國勢力所形成之「事大史觀」，並以朱子學以外的學問為異端且賤踏學術自由的兩班統治階級，以及該階級藉以遂行身分歧視的一系列思想——包含「朝鮮小中華主義」與「事大尊明」等，視作「文化自尊意識」與「韓國式主體性」，實屬「將過去之價值觀與現今之價值觀混為一談」、「無視歷史之時代性」的做法。[86]

李離和認為北伐論風行一時之原因有三：一、係對清兵蹂躪國土之復仇；二、對清朝滅明之復仇；三、統治階層欲鞏固自身之權力而將國民之注意力轉移至國外。[87]前兩者為「事大」精神之展現，故受李氏批評當不在話下。第三項的統治階級轉移注意力之說，亦是其批判之重要根據。李離和在〈北伐〉一文中引當時大臣鄭太和之子鄭載崙之言，指北伐論者實際上心中亦無北伐之

---

85 李離和，〈北伐論의 思想史的 檢討（北伐論之思想史檢討）〉，《창작과 비평（創作與批評）》，10：4（서울，1975），頁 251。

86 此處李氏所指之少壯學者，根據其於注中所載，包括韓永愚、崔昌圭與洪淳昶。其中，韓永愚日後係朝鮮時代史研究之大家，其著述也繼李基白成為韓國各大專院校歷史系學生之指定教科書。見李離和，〈北伐論의 思想史的 檢討（北伐論之思想史檢討）〉，頁 251、270-271。

87 李離和，〈北伐論의 思想史的 檢討（北伐論之思想史檢討）〉，頁 267-26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意；並以此為基礎，認為主倡北伐論的宋時烈一黨藉此在與南人派之黨爭中得利。故此，北伐論不過是黨爭的武器。[88]

李氏在〈北伐〉文末引韓國民族史家朴殷植「所謂小中華者，係自甘為他國奴隸之徽號」之語，批判這些強調朝鮮小中華思想為文化自尊意識或韓國式主體性的少壯學者在「發現價值與方向錯誤之時不知反省」、「完全是一種思想上的麻痺」。[89]

換言之，李離和認為當時一些年輕學者欲將小中華主義或事大思想當作「韓國的傳統」或「呈現韓國主體性」的做法，是一種既反歷史、邏輯上也漏洞百出的謬誤。意即以李氏立場而言，透過「他律」之事大來彰顯「主體性」，完全無法成立。如此說法自然是從民族主義史學的角度出發，這點亦可由其引用朴殷植之語為證。然而，此說不只在民間有影響力，學院派中亦不乏響應者。其代表為姜萬吉。

姜萬吉在 1976 年所寫的〈國史學의 主體性論 문제〉(〈國史學的主體性論問題〉)一文中，便明白指出了戰後韓國史學界主體性論問題的起因與現況。姜氏指出，由於日本殖民時期御用學者以日鮮同祖、滿鮮史觀、停滯後進性與它律性等史觀顛倒韓國歷史，加以殖民時期學院派學者無法正面對抗殖民史觀，樹立韓國史之主體性遂於戰後成為韓國史學界的優先課題。[90]

而其中之「事大主義」問題，便是當然的克服對象。然而，姜萬吉亦承認立足於民族史學之批判有其限制；且特別強調這種為樹立主體性所產生的反效果（역기능）。姜氏指出，事大主義之克服作業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強調朝鮮採取事大之態度係源自於對先進文物之憧憬；第二階段為區分「事大關係」與「事大主義」之不同，認為朝鮮歷史上對遼、金、元、清之事大只是採用傳統的外交原理，與對明之慕華思想不可一概而論；第三階段則是肯定朝鮮後期的慕華思想，認為這是一種出自於對東洋傳統思想與文化的驕傲與保存意識，於是這種慕華思想（即小中華思想）便不再是事大主義，而是以身為東洋文化守護者之姿所發，遂合理化了北伐論與斥邪衛正論，使之成為恢復韓民族歷史

88 李離和，〈北伐論의 思想史的 檢討（北伐論之思想史檢討）〉，頁 269。

89 李離和，〈北伐論의 思想史的 檢討（北伐論之思想史檢討）〉，頁 270。

90 姜萬吉，〈國史學의 主體性論 문제（國史學的主體性論問題）〉，收入氏著，《分斷時代의 歷史認識：姜萬吉史論集（分斷時代的歷史認識：姜萬吉史論集）》（서울：創作과 批評社，1988），頁 52-53。

臺大學術期刊論文

主體性的理論。[91]

針對此般所謂「克服事大主義」的論調，姜萬吉以朝鮮後期北學派實學者的反省為據，認為這種堅持名分論的慕華思想阻斷了朝鮮唯一接受先進文明的道路——即清朝之文明，並使朝鮮之文化後退、政治與社會制度也隨之僵化。因此，姜氏以為，與發展、復興朝鮮語言學、地理學之北學派實學者相較，名分論者（即小中華主義者）與北學派實學論者何者才能顯現朝鮮之主體性，應是再清楚不過。[92]同時，他還說到：

> 然而，正如克羅齊（作者按：應指主張「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的義大利史家貝內德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所云，復古主義式的歷史研究即便在某些程度上能帶來創造之活力，「這種相信復古的現實及其可能性的信念，不過是一種幻想罷了。已經發生的事無論如何都無法回復」。即便如此，仍對毫無創造性活力的過去之事，投以這類不分青紅皂白、毫無分別、毫無限度之復古式鄉愁，為了歷史研究本身，也為了政治現實、文化現實、乃至於為了未來，都是必須清算之對象。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復古主義，最終不只會使歷史學的科學態度為之傾頹，其於政治、社會、文化現實等各方面，更將招致反時代、反歷史之禍。[93]

透過姜萬吉的這段文字，我們看到了韓國民間派史學與學院派史學的交集：在他們眼中，這種復古主義、懷古主義透過「中華」這「他律」的來源（即小中華或朝鮮中華主義）以樹立主體性之作法，是一個反時代、反歷史、思想麻痺的產物，極不可取。姜萬吉批判之脈絡雖與李離和不盡相同，但他們代表韓國

---

91 姜萬吉，〈國史學의 主體性論 문제（國史學的主體性論問題）〉，頁 58-59。

92 姜萬吉，〈國史學의 主體性論 문제（國史學的主體性論問題）〉，頁 59-60。

93 即「그라나 그로체와 말한 것과 같이 복구주의적 역사연구와 서술이 어느 정도의 창조력을 가져다 준다 하여도『복귀의 현실 또는 가능성을 믿는 신념은 하나의 환상일 뿐이다. 이미 있었던 일의 어느 것에도 다시 돌아갈 수는 없는 것이다.』그런데도 불구하고 아무런 창조적인 활력을 구할 수 없는 지난 일들에 대한 무질서하고 무분별하고 무한정적인 복고적 향수는 역사학 연구 자체를 위해서는 물론 정치현실, 문화현실 내지 그 미래성을 위해서도 시급히 청산되지 않으면 안될 것이다. 무질서하고 무분별적인 복고주의는 마침내 역사학에 있어서의 과학적 인식태도를 흐리게 할 뿐만 아니라 더 나아가서 정치, 사회, 문화현실에 있어서 반시대적, 반역사적 현상을 초래할 것임을 더 말할 나위가 없다」。姜萬吉，〈國史學의 主體性論 문제（國史學的主體性論問題）〉，頁 60。

史學界反對在「內在的發展」框架下過度肯定小中華主義，卻是不爭的事實。[94]而他們的聲音，也可以視為對「內在的發展論」所造成負面影響的一種警覺。

1990 年代以降，隨著「朝鮮中華主義」肯定論的影響力日漸提高，一些學者也開始反省這種歷史解釋是否合理。特別是 2000 年以降，伴隨著後現代史學風潮之高漲，加以中國、韓國、日本各自取得了經濟發展上可觀的成果，再度掀起了一波批判朝鮮中華主義論的運動。而這次論戰的參與者亦屬當代的少壯派學者，代表人物為桂勝範與鄭多函。

桂勝範亦將朝鮮中華主義學說之起源歸於鄭玉子，這點與鄭玉子學生禹景燮所論相同。桂氏更進一步指出，朝鮮中華主義論的史學史意義，實際上與「內在的發展論」框架息息相關。1945 年戰後，韓國史學界為了尋找克服殖民史觀中的他律性與停滯性論論據，不斷嘗試各種方法論。而朝鮮中華主義論亦屬其中。[95]

但桂氏反對使用此一學說與框架。他認為，朝鮮中華本身就是一個脫離現實的意識形態：因為朝鮮已完全進入清秩序的影響範圍。[96]而其批判之論據，則是將朝鮮之於明清交替期之華夷觀，與高麗時代士人對元之觀感對照。桂勝範指出，高麗時代士人多認同元為中華，並不視之為夷狄，這是因為在「華」的三要素：種族、地域、文化中，元已擁有其二之故。然而，朝鮮後期之士人卻無視於這一現實，僅僅以文化水準之高低與種族之屬性，否定清朝之為中華。以韓國史之長時段脈絡而言，這其實是非常特殊的現象。[97]

---

[94] 姜萬吉的批評與其現實關懷甚為相關。姜氏不只質疑韓國史之主體性問題，他更關心的是在兩韓分裂（即分斷時代）狀態下，歷史學者受制於軍事獨裁體制，遂刻意跳過獨立運動史、耽溺於從事無關解決兩韓問題之前近代韓國史研究；更擔憂歷史學者就此依附於軍事獨裁者所設下之民族主義口號，使韓國史、乃至於韓民族無法進一步發展，達成現代化。此即姜氏將論史之文集命名為《分斷時代的歷史認識》之因。詳見姜萬吉，〈分斷時代 史學의 성격（分斷時代史學之性質）〉、〈國史學의 現在性 不在問題（國史學之現代性闕如問題）〉，收入氏著，《分斷時代의 歷史認識：姜萬吉史論集（分斷時代的歷史認識：姜萬吉史論集）》，頁 13-24、38-50。徐仲錫，〈民族史學과 民族主義（民族史學與民族主義）〉，收入宋建鎬、姜萬吉等編，《韓國 民族主義論》（서울：創作과 批評社，1988），頁 328-334。

[95] 계승범，〈조선후기 조선중화주의와 그 해석 문제（朝鮮後期朝鮮中華主義與其解釋問題）〉，《한국사연구（韓國史研究）》，159（서울，2012），頁 271。

[96] 계승범，〈조선후기 조선중화주의와 그 해석 문제（朝鮮後期朝鮮中華主義與其解釋問題）〉，頁 274。

[97] 계승범，〈조선후기 조선중화주의와 그 해석 문제（朝鮮後期朝鮮中華主義與其解釋問題）〉，頁 275-27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時，他也批判了十八世紀的北學論與「去中華論」。桂勝範指出，北學派肯定清朝為中華正統與呼籲應向清學習先進文化，其實只不過是回歸到高麗時期士人對元之觀感，因此不能算是去中華之表現；而強調箕子之地位，乃係箕子依儒家價值觀教化朝鮮之故，亦不能以此視為「自國意識」之增長——其實現春秋義理之對象仍是中國天子，故僅僅是「中華的自我內化」(중화의 자기내면화)。[98]

從以上的論述中，不難看出桂勝範已全面解構朝鮮中華主義論及其相關衍生學說之立論基礎。桂氏更以此為基礎，稱朝鮮中華思想只不過是「以中華之權威為安慰的自我意識作業的一環」。[99]在批判完朝鮮中華主義根本屬性後，桂氏對朝鮮中華主義論者之評更是尖銳。他說到：

> 朝鮮後期知識分子將中華意識與驕傲感內化，在當時的狀況下其極為可能，而其實際效果亦至為可觀。問題在於，後世的一些歷史學家在研究朝鮮中華主義這一現象時，比起窮盡可能客觀分析，更傾向於相信當時知識分子所主張之朝鮮中華主義的內容並隨之起舞。[100]

換言之，相較於昧於現實而主張朝鮮中華之朝鮮後期知識分子，桂勝範認為這些主張朝鮮中華主義論的學者更不應該。因為他們非但不能客觀分析朝鮮中華的歷史意義與其內在性質，反而還相信當時人所主張之意義。就這點而言，其批判脈絡雖與李離和相異，結果卻相同。至於為何後世歷史研究者不能跟隨朝鮮中華論起舞，桂氏有以下說明：

> 希望不要再有「即便積極接受朝鮮中華主義學說也無所謂，好歹我們克服了殖民史觀」這種說辭。因為一方面雖看似已藉由此一方式克服了殖民史觀，但總有一天它會如回力鏢一般傷及自身。原因在於，以近代之視角而觀，將自尊之根據與方法歸之於中華的朝鮮中華主義，

98 계승범，〈조선후기 조선중화주의와 그 해석 문제(朝鮮後期朝鮮中華主義與其解釋問題)〉，頁 282-283。

99 계승범，〈조선후기 조선중화주의와 그 해석 문제(朝鮮後期朝鮮中華主義與其解釋問題)〉，頁 286。

100 「조선후기 당시 지식인들이 조선이 중화라는 의식과 그런 자부심을 내면화시킨 것은 당시 형편상 충분히 가능한 일이었고 실제로 그 가시적인 효과도 지대했다. 문제는 후대의 일부 역사학가들이 조선중화주의 현상을 연구하면서 그 것을 최대한 객관화해서 분석하고 해석하려 하기보다는 당시 지식인들이 주장한 조선중화주의 내용을 상당 부분 그대로 믿고 따른다는데 있다」。계승범，〈조선후기 조선중화주의와 그 해석 문제(朝鮮後期朝鮮中華主義與其解釋問題)〉，頁 287。

依舊具有被解釋為「他律性」例證的可能性。[101]

由此，我們看到了包括桂勝範在內的幾代韓國史學者之共同焦慮：他律性之魔咒。對主張朝鮮中華主義說的學者而言，此說是標榜朝鮮之主體性以粉碎它律性論的武器；更是顯示朝鮮具有「內在的」且「發展的」性質之證據。然而，當時朝鮮知識分子之依歸仍是中華思想與天下觀，故實際上無法產生真正的自國意識或新的認同。因此，若以此指稱朝鮮歷史仍是「他律的」，將無從反駁。此即桂勝範之憂慮。

同時，桂勝範的憂慮，正好也證實了他律性這一命題至今仍深深困擾韓國史學界。這使桂氏即便批判包含朝鮮中華主義論在內的內在發展論研究傾向，也不得不以海外派兵這個脈絡重新梳理中韓關係，以求讓朝鮮時期韓國歷史之樣貌擺脫他律性而具有「內在的」且「發展的主體性」。[102]意即他在高呼不要踏入另一個他律性陷阱之時，恰恰說明其自身亦處於「主體性」與「他律性」之間。

而鄭多函對朝鮮中華主義論的批判，乃是建築於對二十世紀後半葉以降，韓國史學界所流行的「事大」與「交鄰」兩種解釋框架之上。鄭氏以為，戰後韓國史學界在批判殖民史觀的同時，面臨了雙重困境：一是處於美國霸權下知識分子的困境，二是美國霸權下韓國定位的困境。[103]在面對美國霸權宰制之下，知識分子必須尋找能與美國霸權以及其所代表之西歐現代性抗衡之物，此時具傳統性的儒教就成為了其所寄予的工具。

然而，該儒教「傳統」有兩大缺點：它是相對於現代性的「後進」表徵；以及它曾經是日本殖民史觀的工具。於是，他們必須揭示儒教的進步特徵，造成了盛極一時的「儒教肯定論」。[104]在這一論述下，形塑出了積極「事大」的朝

---

101 「조선중화주의 학설을 적극 수용하더라도 적어도 그것으로써 식민사관을 극복했다는 식의 말은 하지 않았으면 한다. 한편으로는 극복한 것처럼 보일 수 있으나, 그것은 언제라도 부메랑이 되어 돌아올 수 있기 때문이다. 왜냐하면 근대의 시각에서 볼 때 自尊의 근거와 방법을 중화로의 귀속에 두고 있는 조선중화주의는 여전히 '타율성'의 한 예로 해석될 소지를 안고 있기 때문이다.」。계승범，〈조선후기 조선중화주의와 그 해석 문제（朝鮮後期朝鮮中華主義與其解釋問題）〉，頁 289。

102 詳見계승범，《조선시대 해외파병과 한중관계：조선 지배층의 중국인식（朝鮮時代海外派兵與韓中關係：朝鮮統治階級的中國認識）》。

103 정다함，〈'事大'와 '交隣'과 '小中華'라는 틀의 초시간적인 그리고 초공간적인 맥락（「事大」、「交鄰」與「小中華」框架的跨時空脈絡）〉，《한국사학보（韓國史學報）》，42（서울，2011），頁 293。

104 정다함，〈'事大'와 '交隣'과 '小中華'라는 틀의 초시간적인 그리고 초공간적인 맥락（「事大」、「交鄰」與「小中華」框架的跨時空脈絡）〉，頁 295-296、30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鮮世宗時期在科學技術、文化上都達到高度發展的圖像，朝鮮王朝因此成為韓國史中的「近世」時期。而之後朝鮮「走向近代化的挫折」，並非儒教的後進性之故，而係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所肇。因此，1960 年代以降的韓國史學界普遍認為，事大是為了吸收先進文明，且必須區分日本人所說的事大與國史上的事大。[105]是以鄭氏以為「事大」成為傳統與文明之象徵，並藉中華文明之普遍性來對抗美國所代表之西歐近代性，實為一種跨越時空脈絡之發明；同時，這也是韓國史學界在一國史框架中的民族主義防禦姿態。

而與事大相關的「交鄰」框架也是鄭多函集中批判之所在。他指出，依據二十世紀後期以降的「交鄰」說，朝鮮與女真、對馬島、幕府等勢力之間乃是平等、互惠之水平關係；同時，此說將朝鮮視為文化僅次於明朝之國，同時也是面向女真、對馬島的文明傳播者。然而，這種論述不僅是誤讀史料，更是企圖藉此忽視朝鮮對女真、對馬島發起戰爭之事實，實為一種以「良善」之外表將朝鮮包裝成不得不反擊之「受害者」的偽善，並以此隱藏這些學者的民族主義心態。更諷刺的是，這種論調實與當時日本侵略的藉口頗為雷同。[106]

鄭氏認為這種「交鄰」框架根本忽略了朝鮮對待女真、對馬島與幕府間的差異。換言之，這些學者既忽視了當時朝鮮對待這些周邊國家在態度上之差異性，又採用「事大」框架的標準——朝鮮係為吸收先進文明而事大，且將朝鮮視為文明傳播者來評斷周邊國家，重新塑造朝鮮對外關係之歷史相。[107]因此，這其實是一種依照明朝中心主義所產生的優越感，以及在這一優越感下所衍生的位階秩序。如此之「交鄰」，實際上也是一種跨時空脈絡之發明，同時是在美國主導的新秩序下韓國知識分子假託於歷史學的當代自我定位。[108]

既然是一種發明，因此更為重要的也就不是原來的中心明朝，而是新形成的「小中心」：朝鮮。他說到：

---

105 此即姜萬吉所轉述之事大與事大主義不同之分。정다함，〈'事大'와 '交隣'과 '小中華'라는 틀의 초시간적인 그리고 초공간적인 맥락(「事大」、「交鄰」與「小中華」框架的跨時空脈絡)〉，頁 297、299。

106 정다함，〈'事大'와 '交隣'과 '小中華'라는 틀의 초시간적인 그리고 초공간적인 맥락(「事大」、「交鄰」與「小中華」框架的跨時空脈絡)〉，頁 303-304、307。

107 정다함，〈'事大'와 '交隣'과 '小中華'라는 틀의 초시간적인 그리고 초공간적인 맥락(「事大」、「交鄰」與「小中華」框架的跨時空脈絡)〉，頁 302。

108 정다함，〈'事大'와 '交隣'과 '小中華'라는 틀의 초시간적인 그리고 초공간적인 맥락(「事大」、「交鄰」與「小中華」框架的跨時空脈絡)〉，頁 311。

臺大圖書館典藏庫

> 因為就近代國民國家邏輯而論，其之所以全盤接受當時朝鮮統治階層將自身視為小中華的思維模式，是因為雖然這是一個外來的文物，但倘若朝鮮將之發展得更好，那它就是「我們的」傳統與文明。[109]

換言之，鄭多函批判既往研究在國民國家（民族國家）優先的前提下，過度強調小中華的重要性：小中華雖然有著「外來」與「他律」之性質，但是因為具有指示當代韓國走向與國際定位的現實意義——即以其可塑造主體性，故將之發明為自身的傳統與文明也無不可。如此，則亦屬一種走在「主體性」與「他律性」之間的表徵。

（三）「明朝後無中國」：來自中國學界的論述與反證

「明朝後無中國」一語出自復旦大學葛兆光之手，最早是一篇以朝鮮《燕行錄》與日本《華夷變態》等書之記錄，說明十七世紀以後「已無中華」與「再無東亞認同」之作。[110]這一來自中國學界的研究成果，本與韓國史學界之朝鮮史研究不盡相關，卻意外點出了兩個有趣的問題：一、為何葛兆光會認為，或以此推論十七世紀後無中華；二、當時中原人士、朝鮮人與日本人眼中的「中華」是同一個中華嗎？

首先，第一個問題與葛兆光個人的關懷有關。他曾撰文指出，當今中國史研究中，已開始習慣使用各種新的架構、框架與方法來拆解「中國」這個歷史單位。但對他而言，「中國」有獨一無二的歷史文化，至少在宋代以降已形成一個「漢族中國」的歷史單位；故這些新的研究方法，無論是地域社會、後現代、東亞等等，都不應也不具有拆解「中國」之合理性。因此，他宣稱要「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111]在此一關懷下，「東亞」便成為了葛氏箭靶之一。

---

109 「왜냐하면 중화를 전유하여 스스로 소중화로 자리매김한 당대 조선지배층의 인식론과 논리를 아무런 비판없이 다시 전유하는 근대국가의 논리는, 비록 외부로부터 수용된 문물이었지만 그것은 조선에서 보다 더 발전하였고 그렇다면 그것은 곧 '우리'의 전통과 문명이라는 것이기 때문이다.」。정다함，〈'事大'와 '交隣'과 '小中華'라는 틀의 초시간적인 그리고 초공간적인 맥락（「事大」、「交鄰」與「小中華」框架的跨時空脈絡）〉，頁 314。

110 葛兆光，〈「明朝後無中國」——再談十七世紀以來中國、朝鮮與日本的相互認識〉，《東亞文化交涉研究》，別冊 1（吹田市，2008），頁 17-23。

111 葛兆光，〈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二十一世紀》，90（新界，2005），頁 90-103；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臺大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如〈明朝後無中國〉一文中便道：

> 乾隆年間，一個叫做金鍾厚的人，給曾經出使清帝國的洪大容寫信，說「所思者在乎明朝後無中國耳，仆非責彼(指中國人)不思明朝，而責其不思中國耳」。在他們心目中，中華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文明並不在清國，那麼我「寧甘為東夷之賤，而不願為彼之貴也」。這個時候的朝鮮人，早就不將清帝國視為「中華」了……近來，很多學者包括日本、韓國以及中國的學者，都好談「亞洲」這個話題，有時候，「東亞」作為一個和「歐洲」或著「西方」對應的文化共同體，似乎也成了一個不可言喻的存在。可是，如果這個「東亞」真的存在，恐怕只是 17 世紀中葉以前的事。[112]

如前段引文所述，葛氏以為十七世紀以降隨明亡後，朝鮮、日本已將「中國」視為夷狄，故此後東亞三國分道揚鑣，再無東亞認同。這一論據相當重要，因為朝鮮、日本人的對清認識，如同證明了十七世紀明亡以前有一個真實存在的「漢族中國」。如此，這一「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便透過周邊鄰國之眼而成立了。因此，這篇論文後來陸續以章、節等形式收錄、改寫於其著《宅茲中國》、《何為中國》與《想像異域》等書之中。[113]然而，此處必須追問第二個問題：朝鮮人、日本人所說的中國或中華，究竟所指為何？他們為何如此在意「中華」與「夷狄」之分呢？

日本的部分並非本文所能觸及，故此處僅先以朝鮮而論。如同前文所述，目前韓國學界的共識為，朝鮮人在明亡後，便不再以小中華自居，反而自命為中華嫡統之繼承者。由此，不難理解何以他們會哀痛中國「神洲陸沉」並淪為「夷狄」。而正因為自命為中華之嫡統，他們不只不斷向漢族士人炫耀自己仍身著「大明衣冠」，甚至還跟安南、琉球等國「一爭長短」。葛兆光在〈大明衣冠今何在〉中便提到：

司，2011），頁 1-32。

112 類似的概念葛兆光已於 2008 年之論文中提出。該文後來又收入其氏著，《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中。此處之引文出自《宅茲中國》一書。見葛兆光，〈「明朝後無中國」——再談十七世紀以來中國、朝鮮與日本的相互認識〉，頁 17-23；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頁 157、168。

113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頁 153-170；葛兆光，《何為中國：邊疆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 145-157；葛兆光，《想像異域：讀李朝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27-60。

臺大哲學系圖書館

> 不過，同樣是「事大」與「朝覲」，朝鮮人仍然覺得，只有自己是中華正宗，只要琉球或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靠偏滿清，就打從心裡看不起。乾隆年間的朝鮮使者徐浩修對安南國王阮光平君臣在朝覲的時候，換穿了滿清服裝異常不滿，便明知故問：『貴國冠服本與滿洲同乎？』[114]

這種與安南、琉球使臣一較「正統」上之高低者，正好反映了所謂「朝鮮中華主義」中的「中華繼承意識」。換言之，正是因為朝鮮視自己為中華的唯一繼承者，才在言談與記錄中不斷批判同著「舊制衣冠」的安南、琉球等使臣。這也可以解釋朝鮮使臣為何自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不斷向中原士人詢問自己的「衣冠如何」，也可以理解為何他們在道光年間見到戲臺上的伶人身著舊時衣冠時會有「不意於胡京復見漢官威儀」之感。[115]

如此對「大明衣冠今何在」之執著、與安南或琉球使臣的爭勝心理、乃至於「不意於胡京復見漢威儀」之驚訝，正好證明了朝鮮後期中華思想的部分特點：藉由中華／大明繼承者之身分，使其在文化心態上得以凌駕清朝，彌補其於現實中不得不臣服於清／夷狄之憾，故只能由其繼承大明或中華，而不可以是安南或琉球。而其評斷安南、琉球「文明」與否之標準，則係是否與明朝之文化（如衣冠）相似。

由此，吾人可見朝鮮中華主義之兩面性：對清朝之態度上，它是一種自尊之展現，因此具有主體性；但用明朝之意象或文化標準來展現其優越感、「不意胡京復見漢官威儀」，則顯示其服膺於明朝中國所代表之外來文化，故同時難脫他律性之色彩。因此，與其說「十七世紀後無（文化上之）中國」，不如說朝鮮人認為十七世紀後「朝鮮即（文化上之）中國」。而「漢族中國」也不一定是當時朝鮮人所最在意者，否則彼等便無繼承中華之可能。不論是擁護朝鮮中華主義的禹景燮，或是批判此種思潮僅僅是「國內用意識形態」的桂勝範，都應該會贊同這種說法：因為禹氏認為朝鮮後期士大夫是為了追求東亞文化之精髓、中華之理想；而桂勝範則認為朝鮮士大夫抱著這著時空錯亂的認同，鑄成了朝鮮邁向近代時所難以跨越的門檻。[116]要言之，葛兆光的研究雖並非出自韓

---

[114]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學月刊》，2005 年第 10 期（開封），頁 45；葛兆光，《想像異域：讀李朝漢文燕行文獻札記》，頁 156。

[115] 葛兆光，〈「不意於胡京復見漢官威儀」——清代道光年間朝鮮使者對北京演戲的觀察與想象〉，《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1 期（北京），頁 89-91；葛兆光，《想像異域：讀李朝漢文燕行文獻札記》，頁 194-198。

[116] 桂勝範即指出，朝鮮行大報壇祭禮祭祀明太祖、神宗、思宗直至 19 世紀，顯示朝鮮的「脫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史學界之問題意識與學術脈絡，卻反倒藉由分析大量《燕行錄》之紀事，協助我們了解朝鮮後期中華思想的特性，避免迷失於「歷史化」、「脈絡化」或「近代主義傾向」間的理論路線爭議。[117]故謂之「來自中國學界的論述與反證」，似不為過。

五、結語

戰前日本學者如稻葉岩吉、三品彰英等人，將朝鮮史冠以「停滯性」、「他律性」、「半島性」、「黨派性」等特質，以美化、捍衛日本之殖民統治。因此，如何克服日本人的殖民史觀，便成為戰後幾個世代的韓國史學者所共同面對的核心課題。

而殖民史觀中最核心的理論，則屬「他律性」與「停滯性」二者。為了克服停滯性論，戰後韓國史學者開始尋找韓國史中的「內在的」、「發展的」各種因素，並冀以樹立韓國史之主體性。然而，這並不能完全解決「他律性」這一命題——因為他律性論乃立論於朝鮮之對外關係史實之上，特別是十七世紀朝鮮對明、清之外交關係。

因此，如何重塑十七世紀朝鮮對外關係史相，便成為韓國史學者的另一戰場。其中的一條路線，是肯定光海君的兩端外交政策，其代表論者為李丙燾、韓明基。而韓明基更將十七世紀朝鮮海軍、國內政變等與明清交替、東亞國際秩序變遷等連結，以求凸顯朝鮮之主體性。然而，這種做法實際上也等同承認了「他律性論」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也不無道理。是以韓明基所樹立的韓國史主體性，可以說是一種建立在他律性之上的主體性。相對之下，桂勝範則以朝鮮

中華」企圖並非將中華客觀化、他者化，而是將之自我內化，故僅僅是不願參與清朝所構築的「新中華」並回歸於明朝之「舊中華」。見계승범，《정지된 시간—조선의 대보단과 근대의 문턱（靜止的時空——朝鮮的大報壇與近代的門檻）》，頁 259-260、263-265；우경섭，〈朝鮮中華主義에 대한 학설사적 검토（關於朝鮮中華主義之學說史的檢討）〉，頁 258。

117 如前所述，桂勝範批判朝鮮中華主義論者無法區分過去與今日之價值觀，禹景燮則批評桂勝範拿近代的眼鏡衡量朝鮮時代人的思維與理想，為反歷史之作為。而後政治學者金英敏推崇新銳研究者對朝鮮後期士人古代史認識之研究，認為如此才能有助釐清朝鮮中華主義的面貌，並能避免落於桂勝範或禹景燮兩種極端之中。見김영민，〈조선중화주의의 재검토（朝鮮中華主義的再檢討）〉，《한국사연구（韓國史研究）》，162（서울，2013），頁 246-248。

臺大學術期刊論文資料庫

時代的海外派兵（與明、清兩朝之協同作戰）來尋找朝鮮之主體性。桂氏以為，朝鮮在明朝正統、成化年間，曾經猶豫、甚至拒絕明朝之派兵要求，足見朝鮮的「事大」有其目的性。而朝鮮真正開始視明朝為父母之邦，則始於朝鮮中宗時期之後。桂勝範此番論述實際上是為了反駁「再造之恩」之說，並凸顯朝鮮之主體性。然而，這便落入了其自身所批判的「內在的發展論」的研究框架之中。因此，無論是韓明基的他律中的主體，或是桂勝範派兵中的主體，都反映了十七世紀朝鮮對外關係史的特徵：走在主體性與他律性之間。

而另一條超克他律性論的路線，則是「朝鮮中華主義論」。該學說認為朝鮮在明亡以後已成為「中華」之正統繼承者，並將尊周思明、華夷觀等思想與韓末之抗日義兵運動連結，認為這是一種時代精神，重新肯定了朝鮮中華思想的歷史意義，使之一掃「事大主義」之汙名。朝鮮中華主義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它已經不再是「小中華」，而是「繼承」了中華。因此，朝鮮中華主義也就成為了克服他律性論、建立主體性的重要武器。

然而，這一學說自其創始之初，便深受韓國學界各種批評。原因在於，朝鮮中華主義係一僅僅強調「中華」中的文化層面、並有深染明朝色彩的思想體系。換言之，批評朝鮮中華主義論者以為，該思想漠視「中華」內涵中的種族與地域之特性，刻意強調朝鮮繼承中華的文明，並且再次陷朝鮮史於他律性——明朝陰影之中。因此，以海外韓國學研究者之立場而言，不論朝鮮中華主義論或反朝鮮中華主義論兩者誰是誰非，雙方的論爭中都透露了一個清楚的訊息：直至今日，樹立朝鮮歷史之主體性與克服殖民史觀之他律性論，仍屬極為重要。而這一訊息，也再度凸顯了自戰後乃至於近來十七世紀朝鮮對外關係史顯著特徵：走在主體性與他律性之間。

至於這種「走在主體性與他律性」之間的現象是否亦見於戰後韓國學界處理對外關係史以外的韓國史研究中、其歷史論述的特色為何、與同時期台灣、中國、日本等地的國史書寫相較之下又有哪些異同，則是未來研究值得繼續深入的方向與課題。

〔作者附記〕本文寫作期間，承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韓哲閔（Han cheol-min）、韓國高麗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課程金元英（Jin Yuan Ying）協助蒐集大量韓文出版品，特此誌謝。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近人論著

（一）專著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葛兆光，《何為中國：邊疆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葛兆光，《想像異域：讀李朝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三品彰英，《朝鮮史概說》，東京都：弘文堂書房，1940。

三品彰英，《北鮮と南鮮》，京都：ハ-バード・燕京・同志社東方文化講習會，1957。

寺內威太郎等編，《植民地主義と歷史学—そのまなざしが残したもの—》，東京都：刀水書房，2004。

稻葉岩吉，《光海君時代の滿鮮關係》，東京都：国書刊行会，1976。

稻葉岩吉，《朝鮮文化史研究》，東京：雄山閣，1921。

姜萬吉，《분斷時代의 歷史認識：姜萬吉史論集（分斷時代的歷史認識：姜萬吉史論集）》，서울：創作과 批評社，1988。

강만길，《역사가의 시간：강만길 자전서（史家的時光：姜萬吉自傳回億錄）》，파주：창비，2010。

계승범，《정지된 시간—조선의대보단과 근대의 문턱（靜止的時空——朝鮮的大報壇與近代的門檻）》，서울：서강대학교 출판부，2011。

계승범，《조선시대 해외파병과 한중관계：조선 지배층의 중국인식（朝鮮時代海外派兵與韓中關係：朝鮮統治階級的中國認識）》，서울：푸른역사，2009。

宋建鎬、姜萬吉等編，《韓國 民族主義論》，서울：創作과 批評社，1988。

歷史學會編，《韓國史의 反省（韓國史的反省）》，서울：新丘文化社，1980。

오수창，《조선시대 정치 틀과 사람들（朝鮮時代之政治框架與其人）》，춘천：한림대학교 출판부，2010。

李基白，《李基白韓國史學論集 2・韓國史學의 方向（李基白韓國史學論集 2・韓國史學的方向）》，서울：一潮閣，1997。

이익주編，《동아시아 국제질서 속의 한중관계사：제언과 모색（東亞國際秩序中的韓中關係史：提案與摸索）》，서울：동북아역사재단，2010。

동북아역사재단編，《한중일 학계의 한중관계사 연구와 쟁점（韓中日學界之韓中關係史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研究與爭論點)》서울：동북아역사재단，2009。

정두희、이경순編，《임진왜란： 동아시아 삼국전쟁（壬辰倭亂：東亞三國之戰)》，서울：휴머니스트，2010。

鄭玉子，《조선후기 조선중화사상 연구（朝鮮後期朝鮮中華思想研究)》，서울：一志社，2001。

한명기，《정묘・병자호란과 동아시아（丁卯・丙子胡亂與東亞)》，서울：푸른역사，2011。

John. B. Duncan, *The origins of the Chosŏn dynas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二）期刊論文

葛兆光，〈「明朝後無中國」——再談十七世紀以來中國、朝鮮與日本的相互認識〉，《東亞文化交涉研究》，別冊 1（吹田市，2008），頁 17-23。

葛兆光，〈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二十一世紀》，90（新界，2005），頁 90-103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學月刊》，2005 年第 10 期（開封），頁 41-48。

葛兆光，〈「不意於胡京復見漢官威儀」——清代道光年間朝鮮使者對北京演戲的觀察與想象〉，《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1 期（北京），頁 84-92。

四方博，〈舊來の朝鮮社會の歷史的性格について〉，《朝鮮學報》，1（天理市，1951），頁 193-206。

四方博，〈舊來の朝鮮社會の歷史的性格について（二)〉，《朝鮮學報》，2（天理市，1951），頁 155-173。

四方博，〈舊來の朝鮮社會の歷史的性格について（三)〉，《朝鮮學報》，13（天理市，1952），頁 119-147。

姜晉哲，〈日帝 官學者가 본 韓國史의 「停滯性」과 그 理論（日帝御用學者所見之韓國史之「停滯性」與其理論)〉，《韓國史學》，7（성남，1986），頁 165-222。

계승범，〈광해군대 말엽(1621-1622) 외교논쟁의 실제와 그 성격（光海朝末葉〔1621-1622〕外交路線之實像與其性質)〉，《역사학보（歷史學報)》（서울，2007），頁 1-37。

계승범，〈조선후기 조선중화주의와 그 해석 문제（朝鮮後期朝鮮中華主義與其解釋問題〉，《한국사연구（韓國史研究)》，159（서울，2012），頁 265-294。

계승범，〈파병 논의를 통해 본 조선전기 대명관(對明觀)의 변화(從派兵議論看朝鮮前期對明觀之變化)〉，《大東文化研究》，53（서울，2006），頁 309-346。

고윤수，〈李民寏의『紫巖集』과 17 세기 조선의 遼東문제（李民寏的《紫巖集》與十七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世紀朝鮮之遼東問題)〉,《東北亞歷史論叢》,1:9(서울,2006),頁 125-151。

金聲均,〈朝鮮中期의 對滿關係(朝鮮中期之對滿關係)〉,《白山學報》(천안,1978),頁 3-44。

김영민,〈조선중화주의의 재검토(朝鮮中華主義的再檢討)〉,《한국사연구(韓國史研究)》,162(서울,2013),頁 211-252。

오항녕,〈내상과 외상을 넘어-인조시대 대내외 정책-(克服內傷與外傷——仁祖時代之對內外政策)〉,《한국불교사연구(韓國佛教史研究)》,4(서울,2014),頁 40-80。

우경섭,〈'再造藩邦'에서 '非禮不動'으로:바위에 새겨진 명나라에 대한 두 가지 기억(從「再造藩邦」到「非禮不動」——石巖上的兩種明朝記憶)〉,《한국학연구(韓國學研究)》,28(인천,2012)頁 1-22。

우경섭,〈朝鮮中華主義에 대한 학설사적 검토(關於朝鮮中華主義之學說史的檢討)〉,《한국사연구(韓國史研究)》,159(서울,2012),頁 237-263。

禹景燮,〈宋時烈의 華夷論과 朝鮮中華主義의 성립(宋時烈的華夷論與朝鮮中華主義的成立)〉,《진단학보(震檀學報)》,101(서울,2006),頁 257-289。

李離和,〈北伐論의 思想史的 檢討(北伐論之思想史檢討)〉,《창작과 비평(創作與批評)》,10:4(서울,1975),頁 249-272。

이병도,〈광해군의 대후금 정책(光海君之對後金政策)〉,《국사상의 제문제(國史上之諸問題)》,1(서울,1959),頁 135-173。

이영호,〈'내재적 발전론' 역사인식의 궤적과 전망(「內在的發展論」歷史認識的軌跡與展望)〉,《韓國史研究》,152(서울,2011),頁 239-272。

이천창,〈한국사 파악에서 내재적 발전론의 문제점(韓國史理解脈絡下內在的發展論之問題)〉,《한국사시민강좌(韓國史市民講座)》(서울,2007),頁 1-20。

정다함,〈'事大'와 '交隣'과 '小中華'라는 틀의 초시간적인 그리고 초공간적인 맥락(「事大」、「交鄰」與「小中華」框架的跨時空脈絡)〉,《한국사학보(韓國史學報)》,42(서울,2011),頁 287-323。

鄭玉子,〈正祖代 對明義理論의 整理作業-〈尊周彙編〉을 중심으로-(正祖時期對明義理論的整理作業——以〈尊周彙編〉為中心)〉,《韓國學報》,18(서울,1992),頁 75-117。

한명기,〈광해군-외교의 '빛'과 내정의 '그림자'-(光海君——外交上之「光輝」與內政上之「陰影」)〉,《한국사시민강좌(韓國史市民講座)》,31(서울,2002),頁 62-78。

한명기,〈조중관계(朝中關係)의 관점에서 본 인조반정(仁祖反正)의 역사적 의미 -명(明)의 조선에 대한 "의제적(擬制的) 지배력(支配力)"과 관련하여-(從朝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關係的觀點看仁祖反正的歷史意義——關於明對朝鮮的「虛擬的支配力」)〉,《南冥學研究論叢》,16(진주,2011),頁 239-279。

한명기,〈원명교체, 명청교체와 한반도(元明交替、明清交替與韓半島)〉,《세계정치(世界政治)》,30:2(서울,2009),頁 61-98。

韓明基,〈16, 17 세기 明清交替와 한반도-'再造之恩', 銀, 그리고 쿠데타의 변주곡-(16、17 世紀明清交替與韓半島——「再造之恩」、銀與政變的變奏曲)〉,《明清史研究》,22(서울,2004),頁 37-64。

韓明基,〈光海君代의 對中國 관계(光海君朝之對中國關係)〉,《진단학보(震檀學報)》,79(서울,1995),頁 93-134。

韓明基,〈재조지은(再造之恩)과 조선후기 정치사 -임진왜란~정조대 시기를 중심으로(再造之恩與朝鮮後期政治史——以壬辰倭亂至正祖朝時期為中心)〉,《大東文化研究》,59(서울,2007),頁 191-230。

韓明基,〈폭군인가 현군인가 광해군 다시 읽기(暴君抑或明君?再讀光海君)〉,《역사비평(歷史批評)》,44(서울,1998),頁 156-227。

(三)會議論文

韓明基,〈壬辰倭亂, 明清交替와 朝鮮 水軍(壬辰倭亂、明清交替與朝鮮水軍)〉,宣讀於「海戰與東亞世界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2011.9。

(四)參考學位論文

韓明基,《宣祖代 후반~ 仁祖代 초반 對明關係 研究(宣祖後期至仁祖初期對明關係研究)》,서울:서울大學校國史學科文學博士論文,1997。

(五)字典

李熙昇,《민중 국어 대사전(民眾國語大辭典)》,서울:民眾書館,1961。

韓國國立國語院標準國語大辭典(국립국어원 표준국어대사전)線上版

http://stdweb2.korean.go.kr/search/View.jsp(2015.3.2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Between the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Heteronomy: the Features and Controversy over Korean Historiographies of the Chosen dynasty's Diplomatic Policy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after 1945

Meng-Heng Lee
M.A., Dep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Korean historiographies about the Chosen dynasty's diplomatic policy in the 17th century. It has been well-recognized that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Japanese scholars often referred to Chosen history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history of Heteronomy (他律性論)'. Yet contrary to this perspective, in the post-war period, several Korean historians have proven that the history of Chosen was actually self-determined. One example of this effort is their reevaluation of King Kwang-hae (光海君) in Chosen history from a tyrant to a wise monarch, who refused to ally with Ming China and depreciate his successor, King In-jo (仁祖), by attributing Chosen's defeat to Manchu as a result of his pro-Ming policy. A more elaborate example is the empha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Sino-centrism in late Chosen Korea (朝鮮中華主義). This perspective often underlines Chosen's identity as the only inherito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fter the collapse of Ming China. Nevertheless, both of these examples seem to suggest that other countries in East Asia inevitably influenced Chosen. Considering this historical reality, one can note that historiographies of Chosen history divided between self-determination and Heteronomy.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 study of Korean history. The methodologies rely on textual history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and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historiography in Korean academia in terms of Chosen diplomatic history in the post-war period to learn about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of various scholars at certain times and their range of purposes.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heteronomy, self-determination, the revaluation of king kwang-he, sinocentrism in late Chosen Korea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